

破土深耕・開枝散葉：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三十年所慶座談會*

許雪姬、ⁱ 詹素娟、ⁱⁱ 張隆志、ⁱⁱⁱ 劉翠溶、^{iv} 黃富三、^v 施添福、^{vi} 吳叡人、^{vii}
林文凱、^{viii} 曾文亮、^{ix} 陳培豐、^x 陳姪媛、^{xi} 陳宗仁、^{xii} 林玉茹 ^{xiii} 著

莊勝全、** 陳偉智*** 彙整修訂

摘要

2023 年 8 月 1 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臺史所」）舉辦「破土深耕・開枝散葉」設所三十年所慶座談會。許雪姬所長與文化史研究群召集人吳叡人副研究員主持開幕式後，開始一天的座談會。座談會從臺史所的前史，亦即張光直院士延續濁大計畫提出的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談起，回顧成立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到設立臺史所籌備處，再到正式設所，三十年來發展呈現的特色與研究業績。座談會從不同層面指出了三十年來臺史所的發展變遷，有從既往的複數軌

* 本文乃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於 2023 年 8 月 1 日所舉行「破土深耕・開枝散葉：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三十年所慶座談會」，各場次引言人按各自發言內容修訂、彙整而成。各作者的職稱，亦以座談會當時的任職為準。

ⁱ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ⁱⁱ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ⁱⁱⁱ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

^{iv}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v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vi}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vii}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viii}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ix}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x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xi}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xii}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xiii}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來稿日期：2023 年 10 月 24 日；通過刊登：2023 年 12 月 4 日。

跡逐漸累積而成的部分，也有依循學科內部知識生產路徑發展的面向，及回應社會關懷的學術實踐，更有因應時代重要議題而產生的學術研究能量與開展的新領域。

座談會共分四個場次。第一場次「田野調查與多元起源」，詹素娟副研究員談臺史所前身的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與臺灣史田野研究室的創立精神、學術實踐及延續發展；借調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的張隆志副研究員，從史學史與歷史知識的社會脈絡，說明多元起源的臺灣史學史中臺史所的位置。第二場次「開拓與傳承」，由學術成果豐碩的臺史所前輩劉翠溶院士、黃富三老師、施添福老師，分享各自的學思歷程。跨學科對話與實踐，是臺史所從田野研究室時即就已奠定的傳統，因此第三場次「跨學科對話的實踐」，由吳叡人副研究員、林文凱副研究員及曾文亮副研究員，分享非傳統歷史學科班出身，卻跨界進入史學界從事臺灣史研究的經驗、成果與反思。第四場次「歷史視野與史料解讀」，由晚近透過新的研究視野，並使用文字材料以外的各種非典型史料，提出重要研究成果並開創新研究領域的陳培豐研究員、陳姪媛副研究員、陳宗仁研究員和林玉茹研究員，分享各自的研究經驗。

關鍵詞：臺灣史研究所、三十週年、歷史學、回顧與展望

如果將歷史比喻為散落於不同空間的時間碎片，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的研究者們就是在從事偵探的工作，探尋、捕捉關鍵的拼圖，賦予判斷及詮釋，呈現出臺灣歷史的整體圖像。

——《旗展帆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三十年紀錄片》

一、開幕式



圖一 開幕式

說明：左起為許雪姬（主持人）、吳叡人。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提供。

（一）許雪姬

今天的座談會，是要對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簡稱「臺史所」）的過去跟現在進行一些討論。我們有老幹也有新枝，原本文化史研究群在協助策劃的時候，較為缺乏對於老幹的重視，特別是以劉翠溶院士、黃富三教授以及施添福教授為代表的臺史所三位老先覺，他們在各自的領域有其開創性，因此希望他們也能夠來交流如何把自身研究領域建立起來的經驗與感想。今天的座談相當緊湊，共分為四場，在此謹祝大會成功，也特別感謝由吳叡人擔任召集人的文化史研究群。

（二）吳叡人

今天座談主題是「破土深耕・開枝散葉」，顧名思義是檢視臺史所三十年來從播種、深耕、生根到發芽、茁壯的過程。整體而言，不只從縱向的時間軸談臺史所在臺灣史學史脈絡中的起源、發展和奠基（也就是不只提供一個線性敘事），也從橫向角度觀察臺史所的臺灣史研究和不同人文社會學科的互動交流，同時還檢視從周邊、底層與外部的觀點對臺史所學術視野的刺激。透過這樣多面向、立體的反思，盤點一下這些互動與刺激所獲致的成果。最終，我們希望呈現一幅動態、多元而開放的臺史所生命史軌跡。臺史所研究臺灣史，體現臺灣史作為一個專業知識領域，但臺史所自身也是臺灣人百年來追求現代性和主體性努力奮鬥的成果，是臺灣人精神史的結晶。

二、第一場次：田野調查與多元起源



圖二 第一場次

說明：左起為張隆志、許雪姬（主持人）、詹素娟。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提供。

（一）詹素娟，〈在田野找尋臺灣：臺灣史田野研究室的實踐與發展〉

1993年3月27日，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第14屆評議會第6次會議，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通過成立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4月14日，中研院函請總統府祕書長轉請行政院核議；6月10日，行政院函示同意。全案於6月26日經總統府祕書長呈奉總統核定後，臺史所籌備處的成立，正式生效；7月10日，吳大猷院長聘請黃富三教授擔任籌備處主任。這個結果，標示「臺灣史研究」作為歷史學門明確領域的開始；迄今30年，臺灣史研究除了在學術上已經開花結果，更成為社會大眾認識鄉土、連結歷史的重要環節。

然而，臺史所的設立，並非憑空出現，必須回溯1986-1993年間的臺灣史田野研究室時期。但臺史所向來的週年回顧，大多只是背景交代，未曾深入探討或進一步給予歷史定位。既然「三十而立」，研究歷史的單位，對自己的歷史有所盤點整理，實屬應該；何況歲月煙塵，昔日的親身參與者竟已開始凋零，所以這次所慶活動出版的《旗展帆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三十年》一書，即由籌備設所階段擔任召集人的許雪姬特聘研究員，應用公文書檔案以及第1-27期《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撰寫了〈臺灣史田野研究時期（1986.8-1993.6）〉一文，詳述過程與諸多細節。¹ 臺史所同仁林文凱也以學知分析方式，針對田野研究室的學術史定位，撰寫了〈《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986.12-1993.6）：「臺灣（史）研究」的多源匯流與分化共進〉一文，從多重源頭的角度探討戰後迄1980年代臺灣研究或臺灣史研究在各學門的發展脈絡。² 相較之下，筆者則是以見證人身分，試圖以當事人的角色，談論「只有七年的臺灣史田野研究室，究竟有何特殊性，得以在充滿禁忌的年代，促使中研院設立臺灣史研究所？」的經驗與感受。

¹ 許雪姬，〈第壹篇：歷史篇 第一章：臺灣史田野研究時期（1986.8-1993.6）〉，收於許雪姬、鍾淑敏主編，《旗展帆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三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3），頁16-41。

² 該文係林文凱應所慶籌備小組之邀所撰寫，原預計刊登於《旗展帆揚》一書，後因規畫內容異動，未能刊出。

1. 張光直先生與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的設立

臺史所的歷史，可以回溯到 1986 年 8 月 1 日開始執行、張光直先生擔任總主持人的「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尤其是總計畫項下設立的工作室。在執行有成後，1988 年 1 月 1 日，張光直先生在一封寫給吳大猷院長的信函中建議：

從這個計畫一年多來的進展來看，我覺得它很明顯的有力的表現看兩件事實：第一，臺灣史研究上有許多有意義的題目值得學者們積極嚴肅的去做；第二，本院的四個研究所（三民主義、歷史語言、近代史、民族學）中有很大的對臺灣史的研究興趣與研究的力量。

基於上舉的事實，我想向您建議考慮在院裡面設立一個「臺灣史研究中心」或「研究室」，並且把中心或研究室的基本人事和研究經費編入院中的預算。

張先生的意見，經由策畫委員會、執行小組聯席會議的討論後送院，並在 1988 年 4 月院務會議通過，改名「臺灣史田野研究室」。1989 年 8 月開始，經費由院方支援，並以專案計畫編列在史語所。

從任務編組的「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工作室」到編有固定經費的「臺灣史田野研究室」，研究室的性質與角色，一直都是各分支計畫、中研院人文所、學院與民間研究者之間的交流平臺。然而，成立於戒嚴時期，經歷解嚴與其後臺灣社會風起雲湧的政治社會變化，這個位於中研院內的小單位，卻因匯集臺灣史學術研究的多重源頭，而逐漸承擔起「臺灣史研究學院體制化」的期待與要求。具體的訴求，是臺灣史研究所的設立，而推力則落實在張光直先生一次又一次的行動上。

張光直先生為什麼支持設所？如今已經沒有機會從張先生本人獲知他的想法，只能從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與濁大計畫在性質上的延續關係，試圖揣想張先生的理念。

眾所周知，時任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系主任暨中研院史語所兼任研究員的張光直先生，曾在 1971 年返臺籌劃「臺灣省濁水大肚兩河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科技研究計畫」（簡稱「濁大流域人地研究計畫」），並在 1972-1975 年分兩階段執行。參與其中的學者，來自臺大、臺師大與中研院各所，包含地形學、地質學、動物學、植物學、土壤分析、考古學與民族學等學科，研究經費則由臺灣大學與中研

院共同向國科會提出補助申請。³

濁大計畫，是張光直先生從美國橫向移植臺灣的研究概念——整合多學科的區域研究，以探討人類社會文化與自然環境的關係；⁴ 從廣義的歷史來看，這正是「人與土地的自然文化關係史」。十年後的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在體制設計上區分為總計畫與分支計畫：總計畫既負擔行政庶務，也必須完成「動手動腳找資料」的調查工作；分支計畫的加入，除了反映參與者個別的研究興趣，理論上他連結總計畫的主要關懷。試問，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的核心旨趣是什麼？應該就是包含史前史與歷史時期、不分原住民與漢人的「人與土地的人文關係史」。張先生作為一個抱持歷史學觀點的考古學家，⁵ 他所預想的歷史研究，大致有一個足以承載的具體空間或特定區域（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濁大」）；而猶如考古的發掘，歷史學也可以在歷史現場以各種形式（碑記、口述、文獻、地景）取得資料。

此外，研究室是由多學科的人文四所共同參與，提供跨學科的研究框架，因此形成一個相對開放的系統；不特定指歷史學，而是無論什麼學科，只要以時間為尺度進行調查與研究，即是「臺灣史」。對張先生來說，這使得「臺灣史」田野研究室，朝向臺灣「史」研究所的方向發展，就成為毫無疑義的發展了。

2. 臺灣史研究多元脈絡的匯集

緣起於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的研究室，其組成是由人文四所的資深研究員或所長構成決策階層，再由當時最為青壯的四所研究人員負實際規劃，負起執行的責任。因此，研究室從一開始就是多學科的結構，而執行小組成員正是當時臺灣研究多源脈絡的銜接者。

與研究室關係最密切的民族所莊英章先生，是極重視文獻、從事漢人社會研究的人類學家；他與張炎憲、施添福、王世慶等先生的研究合作，都以新竹地區為主要空間，間接促成施添福先生以土牛界、聚落發展為中心的歷史地理學研究。

³ 王崧興，〈濁大流域的民族學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臺北）36「濁大流域人地研究計劃民族學研究專號」（1973年秋），頁1-2。

⁴ 劉益昌，〈世紀考古學者張光直先生與臺灣考古學〉，收於胡健國主編，《20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2），頁95。

⁵ 劉益昌，〈世紀考古學者張光直先生與臺灣考古學〉，頁96。

莊先生捐贈的「金廣福文書」影本，不但成為研究室收藏的第一批地契文書，也因此聘請王世慶先生來研究室帶領同仁、培養解讀古文書的能力，日後並發展出影響深遠的竹塹社研究。莊先生與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武雅士（Arthur Wolf）教授的長期學術友誼，亦連結了邵式柏（John R. Shepherd）、鮑梅立（Melissa J. Brown）等學者與研究室成員共同進行調查的合作關係。

張炎憲先生當時接任《臺灣風物》主編，同仁翁佳音則是助理編輯，⁶ 兩人曾在《風物》37卷2期（1987年6月）製作「平埔研究專題」，刊出潘英海、翁佳音為編輯「平埔族書目」而撰寫的文章；⁷ 潘英海以「學術雞肋」指稱「平埔研究」學術位置的著名比喻，也典出該專輯的〈平埔族研究的困惑與意義〉一文。⁸ 潘英海又將劉斌雄先生1962年親自調查撰寫、但未發表，本人甚至已經沒有留存的〈臺灣南部地區平埔族的阿立祖信仰〉手稿，從邵式柏處取得影印本，在經過劉先生同意後，由李季樺抄謄、校對，再交給《臺灣風物》刊登，成為今日從事南部平埔族群研究最珍貴的參考文獻。⁹

同時，擔任策畫委員的曹永和先生，在研究室開授荷蘭文課程；近史所許雪姬老師的實證史學，與研究室成員的學術養成，都產生密不可分的關係。

研究室成員置身如此多元的學術環境，因此可以多方面接觸各種學科的研究成果，並在個人的研究探索上，各自探循適合的路徑。

3. 是邊緣，也是中心

研究室雖在組織上與人文四所有淵源，也必須密切的互動——如經費係撥入史語所，所有的申購、核銷等行政庶務都必須通過史語所行政室；人員來自各所，人事費因此由各所支應。儘管如此，研究室卻又是相對獨立的單位，差勤、經費、

⁶ 張炎憲自1986年開始接任《臺灣風物》主編，1986年6月至1990年12月的助理編輯為翁佳音、林偉盛，參見〈附錄 臺灣風物編務成員年表〉，《臺灣風物》（臺北）71:1（2021年3月），頁148。

⁷ 此即潘英海的〈有關平埔族研究的西文資料〉、翁佳音的〈日治時代平埔族的調查研究史〉二文，詳見潘英海，〈有關平埔族研究的西文資料〉，《臺灣風物》37:2（1987年6月），頁39-53；翁佳音，〈日治時代平埔族的調查研究史〉，《臺灣風物》37:2，頁55-80。另外，詹素娟為該書目撰寫的〈從中文文獻資料談平埔族研究〉一文，則發表刊登於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研究組編輯，《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論文集》（高雄：該中心，1987），頁243-284。

⁸ 潘英海，〈平埔族研究的困惑與意義：從邵式柏的博士論文「十七及十八世紀臺灣拓墾中的漢番關係」談起〉，《臺灣風物》37:2，頁157-165。

⁹ 劉斌雄，〈臺灣南部地區平埔族的阿立祖信仰〉，《臺灣風物》37:3（1987年9月），頁1-62。

工作項目與進度，都在執行小組召集人的擘劃下循序進行；來自各所的人員，回到母所，其實是圈外人。因此，無論是人際網絡或實際事務，研究室都處於多重邊緣的位置。

因為在邊緣，所以人員、經費、組織，都遊走在「正式」與「非正式」之間，也相對鬆散與自由。對個人來說，我們雖是什麼事都要做的助理，卻被容許發展個人的研究，享有充分的研究自由與成長空間。同時，研究室又在四所之外，自成中心，擁有自治空間，內部關係也相當緊密，可以針對目標一起打集體戰。

事實上，自研究室獲得穩定經費後，不但可以徵集圖書、更便利的調查與收集資料，也開始設置研究生獎助辦法、圖書借閱辦法等，研究與工作都較前具有累積性。研究室雖位於傅斯年圖書館地下室，但有獨立出入口，人來人往，相當便利，院內院外的學者、研究生以及民間友人隨時可以來訪。我們也得到很多關心臺灣研究的師友關愛，著名古物收藏家如林漢章、鐘金水等，都與研究室成為熟友，無償提供文書，供研究室翻拍影印。早期沒有購書經費，研究室的圖書幾乎都是各界或學者捐贈。我們也發信給各鄉鎮公所，調查並收集鄉鎮誌，今天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齊全的臺灣鄉鎮誌，第一波的收集就是在研究室時期。

4. 歷史給予的機會

研究室之所以能朝設所的方向發展，除了張光直先生的力推，1987 年的政治解嚴，引動了臺灣社會力爆發，本土化思潮興起，以及歷史解釋權的爭奪；種種變動，促使研究室承載了臺灣社會的期待與關心，並在因緣俱足後，水到渠成。表一即以對照方式，簡要臚列 1986-1993 年之間研究室變革與外部的關係。

表一 1986-1993 年研究室變革與外部變遷的對照

時間	內部	外部
1986	8/1 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開始，設立工作室，莊英章擔任執行小組召集人（1986.8-1987.7）。	
1987	8：張炎憲接任執行小組召集人（1987.8-1989.7）	7：解嚴 11/25：國民黨籍立委賴晚鐘呼籲在行將設立的中正大學，籌設以臺灣史為導向的史學系。
1988	1/1：張光直寫信給吳大猷院長，建議在研究院設立「臺灣史研究中心」或「研究室」，並編列正式預算。 1/14：丁邦新召集聯席會議，決議改名。	1：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接任總統。

時間	內部	外部
	4:「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工作室」改名「臺灣史田野研究室」。 9/20:張光直寫信給吳大猷院長,希望院長對研究室大力支持。	4:「臺灣史研究會」建議研究院籌設臺灣史研究所,院方以正在專案辦理「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回應。
1989	8:臧振華接任執行小組召集人(1989.8-1991.7)史語所編列「專案經費」	4/8:鄭南榕自焚 5/20:520事件
1990	6/30:吳大猷院長在評議會指示成立「初步研究規畫小組」 7/12:張光直返國召開聯席會議,初步評估「臺灣史研究所」或「臺灣史研究中心」的設立,決議以「臺灣史研究所」為優先。 12/22:規畫小組提出「初步研究報告」,傾向設立「臺灣史研究中心」。惟當時的組織法並無研究中心相關規定。	3:野百合學運 4/12:立法院審查中研院預算,立委洪奇昌、盧修一針對「成立臺灣史研究所」案質詢。 4/13:張炎憲投書《首都早報》,發表〈臺灣史研究與臺灣自我定位:早日設立臺灣史研究所〉 5:郝柏村接任行政院長
1991	8:許雪姬接任執行小組召集人(1991.8-1993.6)	1:行政院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 5:廢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獨臺會案 7:省議員張溫鷹、劉守成向省府提出成立臺灣史研究所質詢。省府接納後,向中央反映,並獲批准在臺灣省文獻會下設立臺灣史研究所。 7/18:張炎憲投書《自立晚報》,發表〈對省文獻會成立臺灣史研究所看法〉 12:終止「萬年國會」
1992	8/31:本室召開聯席會議,討論張光直提出的發展方向,決定建議院方成立「臺灣史研究所」,並委由許雪姬擬定草案。 9/24:提交「設所規畫書」初稿。 11/21:張光直在評議會建議設立「臺灣史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籌備處」。因無法出席,預計在1993年3月討論。	2:「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公布 5:廢除刑法一百條、黑名單解禁 12:國會全面改選
1993	1/14:中研院舉辦座談會,研討臺灣史研究所設所事宜。 2/18:張光直正式向院方提出「建議成立臺灣史研究所案」 3/27:第14屆評議會第6次會議,討論設所規畫案,並獲投票通過。	1:教育部否決中正大學籌設「臺灣研究所案」 3/4:立法院教育委員會立委在謝長廷領軍下拜訪中研院,聽取成立臺灣史研究所等簡報。

由表一可知,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從工作室到設立研究所籌備處的七年之間,正是臺灣社會掙脫威權壓制、朝向民主實踐的關鍵階段。社會的氛圍滲入學院門牆,立法委員對臺灣史研究體制化的關心,成為每次會期的重點;這個「立法院難題」,終於帶來新生的、鬆散的、命名的時刻。

最後,筆者以兩段話作結,提醒自己,這只是「說自己故事」的開始。

我們活在時間中，活在過去、現在、未來的糾纏夾雜中。為了要知道我們自己是誰、我們從哪裡來、又要往何處去、我們要做什麼、我們應該要怎麼做，所以需要說故事，說自己的故事，說自己所屬的群體的故事。我們需要記憶，我們需要歷史。

——蕭阿勤¹⁰

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對我個人而言，很貴重的東西，其實是一種價值、情誼和願景。

——李季樺

（二）張隆志，〈臺灣史知識系譜與學術脈絡中的中研院臺史所〉

歷史學者如何面對自己的歷史？正在記錄和書寫臺灣歷史的研究者們，如何回顧自己學術社群的過去並前瞻臺灣史學的未來？這是多重的挑戰，也是有趣的課題。以下我將分成感謝、回顧、觀察與期待四個部分來進行引言。

1. 感謝

作為臺灣史研究的後進者，我個人的知識啟蒙是在 1980 年代後期，跟著中研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展開，並與臺史所籌備處及臺史所一起成長。我 1986 年進入臺大歷史研究所，1987 年正式決定跟隨曹永和老師做臺灣史。當時臺大成立了臺灣研究社，我們開始調查臺北帝大時期的日文舊籍。1989 年在田野研究室擔任兼任助理時，認識了詹素娟、洪麗完、李季樺、翁佳音等好友，並和潘英海到臺南頭社參訪。也因此利用臺大的岸裡文書完成平埔巴宰族群史的碩士論文。¹¹ 1991 年到美國進修後，仍持續關注平埔族研究會的活動。1993 年臺史所籌備處成立，我在 1995 年到所任職迄今。其間除了 2013-2016 年借調清大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以及三年前借調到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服務外，臺史所就是我整個學術生涯最重要的所在，我的師長、同事和友人們也是這個故事的重要環節。所以今天很高興看到大家能在三十週年所慶，共同呈現學術研究的集體成果。

¹⁰ 黃丞儀、鄭毓瑜、單德興、戴麗娟、詹素娟、蕭阿勤，〈「面對幽暗歷史」的多元路徑：記憶書寫、歷史現場與時代轉折下的「人類境況」座談會紀要〉，收於莊瑞琳總編輯，《春山文藝 3：李登輝 100 年專輯》（臺北：春山出版有限公司；桃園：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23），頁 191。

¹¹ 張隆志，《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一個清代臺灣平埔族群史的重建和理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1）。

撫今思昔，我們其實是臺灣研究史上非常幸運的一個世代。我們沒有經歷戒嚴時期臺灣史作為禁忌或邊陲時那種嚴酷艱辛的政治氛圍與奮鬥歷程，而是臺灣解嚴前後本土化運動與民主化轉型的受益者。在 1980 年代本土研究開始蓬勃發展的時候，我們幸運地進入研究所就讀，親自見證並參與臺灣史的茁壯和發展。作為一個參與者跟見證者，我此時最重要的心情是對於筆路藍縷艱辛奮鬥的前輩們的感動、感恩與感謝。

2. 回顧

關於中研院臺史所作為一個學術機構的歷史探討，隨著今年在 8 月臺史所所史的發表，以及 9 月底相關研討會的舉辦，將會有更多正式的交流。我今天是個人生命史與學思歷程的角度，來做一些非常初步的分享。

面對過去三十年來從臺灣史田野研究室、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到臺灣史研究所成所以來不同階段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從用什麼樣的角度重新回顧跟思考？我想先談論一位非常重要的關鍵人物，就是張光直先生，以及他所領導推動的兩個重要研究計畫：1970 年代的「濁大計畫」與 1980 年代「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¹²

張光直先生在 1972-1976 年推動了「臺灣省濁水大肚兩河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科技研究計畫」（簡稱「濁大計畫」）。這個跨領域的大型計畫除了引進區域研究的新典範，更培養出一批以社會科學觀點與方法研究臺灣的傑出學者，如林滿紅、陳秋坤、陳其南及黃應貴。他們超越傳統文獻掌故學，並能與國際學術潮流接軌，開啟了臺灣史研究的新氣象。¹³

張光直先生在 1986 年回到臺灣，結合了中研院四個主要人文社會研究所的力量，共同推動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1988 年成立中研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之後成為臺史所籌備處的前身，使得臺灣史正式獲得國家最高學術機構的肯認。無論是史語所的實證史料研究、民族所的漢人與原住民人類學研究、近史所的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以及當時的三民主義研究所（後來是社科所、現在的社科中心）的海洋史研究，都在田野研究室時期陸續引介進入臺灣史領域並持續耕耘累積和

¹² 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臺灣史研究》（臺北）16:4（2009 年 12 月），頁 161-184。

¹³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

發展，成為今日臺史所的重要基礎。這個曲折的學術發展過程，絕對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就以個人研究空間為例，1995 年底我由美國返臺到臺史所籌備處報到時，我的辦公室在近史所旁邊的建築小間樓下，後來陸續搬到文哲所的借用空間。我們原來期待在本院郵局旁的黃樓興建一棟結合檔案館、圖書館跟研究空間的臺史所大樓，但因為歷史偶然的因素而落空。而本所在 2007 年搬入人文社會科學大樓時，原先仍期待有獨立館舍，但迄今仍無法如願。臺史所檔案館在 2009 年成立後，經過多年的爭取才終於在大樓南棟有自己的空間，但並不盡符合各項專業需求。

關於臺史所的機構發展史，未來仍需要更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我只是想要說明：臺史所的發展歷程就如同臺灣史領域的成長一樣，從來就不是必然的線性軌跡，而是各種內在因素與外在情境交織辯證的結果。臺史所及所內同仁，事實上從未孤立於中研院及全臺灣的學術與社會發展趨勢之外，這是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點。

3. 觀察

以下我想提出一個比較大膽的觀察和假說。從整體的角度而言，中研院在 1980 年代中後期所開啟的臺灣史研究傳統，和過去官方的臺灣史、民間的臺灣史，乃至於在解嚴後在各國內外大學和區域發展的臺灣研究，究竟有何關連與發展？這個關鍵議題，值得所有關心臺史所和臺灣史發展的朋友們共同思考。¹⁴

雖然我沒有辦法直接回應剛才阿娟（詹素娟）所提出來的兩個重要問題，但是我個人認為臺史所在 1986-1988 年田野研究室時期的紮根醞釀，與 1993 年正式成立臺史所籌備處後的經營發展，在方向上有一個重要的抉擇與斷裂。具體而言，這個轉折點發生在 1993 年當黃富三老師受邀從臺灣大學來到中研院接任首任籌備處主任的時刻。

從今天來看，田野研究室時期是以廣義的「臺灣研究」作為臺灣史的主要對象和內涵，是一個包含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乃至於文學等

¹⁴ 許雪姬，〈臺灣史研究三部曲：由鮮學經顯學到險學〉，《思想》（臺北）16（2010 年 10 月），頁 71-100；王晴佳，〈臺灣史學史：從戰後到當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不同學科，及以綿密細緻的海內外史料蒐集與田野訪查方法所進行的跨學科研究。從各期的《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可以清楚看見這個跨領域的學術取向的充沛活力。另一方面，在 1993 年成立籌備處後的臺灣史研究，則是以狹義的實證歷史學與文獻史料研究為主流。黃富三老師在籌備處草創時期，面對當時的政治氛圍與認同論爭，努力堅持臺灣史專業化與學科化的發展方向，將臺大（與臺北帝大）的歷史研究傳統帶入籌備處。又相較於各研究所的中壯世代研究者，他選擇以正在博士班就讀或學術生涯剛起步的年輕世代人才作為研究主力。這些重大的戰略性抉擇，決定性地影響了中研院臺史所的後續發展。如何公允地分析和評價這些影響深遠的抉擇與決策，將是未來從事臺史所史與臺灣史學史研究者的重要分析課題。

我個人認為這兩個重要的臺灣史研究傳統：專業歷史學與跨領域研究，並非全然互斥和斷裂，而是在過去三十年間不斷交織互動與辯證發展。我們無法重回 1990 年代初期關於成立臺灣研究中心或臺灣史研究所的政策論辯，然而綜觀臺史所的長期發展軌跡，以及現在六大研究群的學術發展動態，可以看到以史料學為基礎所開啟嚴謹實證歷史學研究，尤其是臺史所檔案館在海內外史料徵集整理和數位資源平臺建置的豐富成果，已經成為臺灣政治民主化跟社會多元化的代表性學術成果。今日在臺灣所進行的臺灣史研究，既不同於政治性與工具性的政策研究，更迥異於宣傳性與煽動式的媒體評論。在此同時，臺史所在跨學科對話方面也有值得注目的重要成果：諸如族群史的史料田野、殖民地史的跨國合作、環境史與海洋史的倡議推動，乃至於歷史地理學、歷史社會學及臺灣法律史等重要跨學科與新領域的開拓，都在臺史所發展深化。此外，中研院臺史所除了史料整理外，在課題開發、人才培育及研究國際化方面也有顯著成果，這是臺史所全體同仁應引以為傲的學術成就。¹⁵

4. 期待

在引言的最後，我想提出幾點反省和建議，來和三十而立的臺史所同仁們一起思考。

¹⁵ 參閱許雪姬、鍾淑敏主編，《旗展帆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三十年》。

首先，相較於濁大計畫或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等大型集體研究，臺史所的同仁大多以個人專題研究為主要模式，甚少以研究團隊方式進行共同研究。此種窄而深的研究取徑固然有其優點，但是從全所的整體視角，尤其是中長期學術發展前景而言，亦有其可能限制。

其次，臺史所的研究論著非常注重基礎史料的實證，而臺史所檔案館如今也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立臺灣圖書館以及臺灣大學圖書館，並列為臺灣史料的重要典藏機構。然而相較於臺灣文學同儕在重要議題與學術理論的論辯風氣，臺史所在歷史事實的分析，重要歷史事件的解釋，乃至於史觀理論的探討方面仍待進一步著力。

最後，中研院的臺灣史研究，基本上仍屬於學院歷史學的成果。同仁們非常努力地在自己的崗位上進行學術研究，但是對於學術的公共化，尤其是與社會的連結對話和溝通，乃至於公民的知識素養與歷史意識的提升等方面，多是透過個人參與及社會服務等方式進行，並未以全所的立場和高度進行回應。

總而言之，三十年來臺史所同仁在學術開放自由的氛圍裡從事實證歷史學研究，並開啟多元豐富的學術課題與方向。此一嚴謹樸實的學術風格，並不華麗，更不喧囂，然而已經為新世代研究者們奠定深厚的基礎。我們未來的關鍵挑戰課題之一，在於結合學術研究與知識公共化，對促進當代社會溝通與深化民主發展做出更積極深遠的影響和貢獻。

舉例而言，經過三十年的努力，中研院臺史所並沒有為臺灣社會編寫出一本代表性的臺灣通史著作。最近臺史所與春山出版合作的專書系列，雖然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但仍屬於個人作品。未來大家如何共同完成一部臺灣通史來代表臺史所的集體學術成果，並和國內外臺灣史讀者分享，這是我今天在結語時最想提出的深刻願望和殷切期待。我也會在臺史博和大家繼續努力向前邁進，謝謝大家！

三、第二場次：開拓與傳承



圖三 第二場次

說明：左起為施添福、顧雅文（主持人）、黃富三、劉翠溶。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提供。

（一）劉翠溶，〈從人口到環境〉

我研究人口史是在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經濟所」）時，利用明清時期中國的族譜為基本資料，把族譜記錄的各世代人口的出生、死亡日期轉化為西曆後，然後逐一加以量化計，結果撰寫成《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一書。¹⁶

我個人嘗試研究臺灣環境史是從 1991 年開始。那一年我和中研院經濟所的同仁，共同向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提出一個計畫來研究臺灣環境史。我們分別探討漢人拓墾與臺灣的環境變遷，臺灣的非拓墾性伐林，氣候因素對臺灣農業生產的影響，日月潭水力發電的經濟、社會與生態效果，以及臺灣化學肥料使用量的影響因素等問題。這些研究成果於 1993 年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中提出。這些論文後來收入 1995 年由中研院經濟所出版的《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英文版 *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則於 1998 年

¹⁶ 劉翠溶，《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2）。

由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¹⁷ 我在漢人拓墾與臺灣環境變遷的研究中，主要是以歷史文獻的記載及許多學者對於移民與拓墾的研究為基礎，以聚落及灌溉設施增加的情形來追溯自十七世紀以來臺灣環境的變遷。

我曾在 2002 年 11 月 14-16 日在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舉辦了一次環境史研討會。在這次研討會發表的論文有 21 篇，其中 6 篇關於中國大陸，15 篇關於臺灣。這 21 篇論文分屬於九個主題：(1)水文環境的變化，(2)工業發展與環境，(3)環境變遷之回顧，(4)圖像資料之運用，(5)土地利用與環境變遷，(6)族群與環境，(7)疾病與環境，(8)災害與重建，(9)生態研究與政策。論文發表人和評論人來自不同的領域，包括歷史學、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地球科學、大氣科學、地質學、公共衛生、及環境政策。如同 1993 年的討論會，出席這次研討會的人相當投入於不同領域間的對話。與第一次研討會不同的是，出席第二次研討會的人不只限於論文撰稿人和評論人，而是開放給來自各大學的教授和研究生，而他們也相當踴躍地參與討論。不過，這次研討會的論文並未結集出版，而是由論文發表者自行投稿到不同的期刊。

我曾籌劃舉辦三次東亞環境史國際研討會。第一次是在 2011 年於中研院舉行。第二次是在 2013 年於國立東華大學管理學院舉行。第三次是在 2015 年於日本香川縣高松市（Takamatsu, Kagawa, Japan）舉行。這三次國際研討會的論文都曾結集出版論文集。¹⁸ 最近幾年，我大致上集中時間於收集有關新冠病毒肺炎 COVID-19 流行的資料，已經收集了臺灣、中國大陸、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資料，希望能夠結集成專書出版。

臺史所正式設所至今已滿三十年，臺灣史研究也已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課題，值此三十年所慶，謹祝臺史所的學術成就日益精進，並引領這一個領域不斷的進步。

¹⁷ 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Mark Elvin and Ts'ui-jung Liu, eds., *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¹⁸ Ts'ui-jung Liu, 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ast Asia: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4); Ts'ui-jung Liu, ed., *Local Realitie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6); Ts'ui-jung Liu, Andrea Janku and David Pietz, eds., *Landscape Change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East Asia: Perspectives from Environmental History*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8).

（二）黃富三，〈臺灣史上的大家族社會與商業傳統〉

農商連體經濟是臺灣社會經濟發展史的一大特色，擁有豐富資源的地方大家族即於其間扮演重要角色，而商業傳統自 1624 年荷蘭人領臺後即啟動，對日後的歷史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力，因此自 1993 年臺史所籌備處成立後即設立「社會經濟史研究群」，與族群史、殖民地史及稍後設立的文化史等研究群，構成發展重點。個人除擔任籌備處主任外，有相當長的時間兼任社會經濟史研究群的召集人，值此三十週年而立之時，或可追思一下當時的背景與發展概況。

1. 家族史：「無心插柳」

1979 年美籍學者 J. M. Meskill 寫了一本名著：*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 1729-1945*，被譽為中國地方史的典範佳作。¹⁹ 霧峰林家下厝後人林正方見後，認為應該有一本臺灣人寫的林家豪宅及其歷史，因此找到臺大土木研究所所長王鴻楷，主持林家建築物之調查研究。王教授因其專長非歷史，因此請歷史系主任徐泓找我談，希望我負責撰寫歷史部分，隨後即應林先生之邀會面。當時我婉拒，原因是第一 Meskill 已出版一本出色的書，自認很難超越；第二，我問林先生是否有原始資料，答案是無；第三，我因從劍橋大學抄錄不少怡和洋行檔，正向國科會申請研究洋行研究。然而，林先生一而再邀宴力勸，並說任何條件他都可接受。其後，他又找林獻堂孫子林博正遊說，我不得已提出一個條件，至少要提供林獻堂日記。博正先生似乎有點猶豫，說他們自己都還沒讀過，不知內容如何，必須與族人商量。我以為此事告終，但不久後，又被邀談，同意我閱讀，條件是，我前往其保險公司辦公室閱覽；第二，其內容以及未來完成著作後要經由其檢查是否涉及家人隱私。既然他們如此器重，我只得接受賭一下。

1987 年我完成清代《霧峯林家的興起》一書，隨後好幾個大家族後代都來找我寫他們的家族史，如黃卓權、林本源家，因此陸續寫了數本與數篇大家族史的書與論文，但前者未接受；接著在 1992 年出版《霧峯林家的中挫》，以及多篇有關板橋林家、霧峰林家的學術論文，加上《林獻堂傳》一書。²⁰ 霧峰林家似乎

¹⁹ Johanna Menzel Meskill,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 1729-189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²⁰ 黃富三，《霧峯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一七二九-一八六四）》（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

由默默無聞變得廣為人知，宮保第等林家建築群也成為觀光聖地。這可說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今天就談談其中心得吧！

（1）臺灣大家族的產生及其特色

A. 臺灣大家族何以產生於清代？

荷蘭時代：移民少，時間短，大家族須數代的繁衍才能形成，故無地方大家族出現。

明鄭時代：漢人雖大增至十萬人以上，但時間亦不長，並無大家族之出現。
清代：是大家族崛起的時代，主因是統治時間長達 212 年，而且漢人人口大增，甚至取代原住民為新主人，所謂日久他鄉變故鄉，由「落葉歸根」轉為「落葉生根」，大家族接二連三崛起。

B. 臺灣家族的特色

a. 平原發展為主：由於臺灣是農業寶庫，米糖等農產品大量出口至大陸，反之，手工業不發達，日用品高度仰賴大陸進口，兩岸形成緊密的互補經濟體。故擁有資源的富家大多在平原發展發展農業，而地主與郊商是大家族的主體，如施世榜家、林本源家等。其中林本源家富甲全臺，甚至可能全清帝國。

b. 山區發展特例：霧峰林家、客家族群。但隨著大平原開發殆盡，部分家族冒險至淺山地區拓墾番界土地。又隨著山區特產的外銷大增，以樟腦、茶葉為主，亦出現次級的大家族，如霧峰林家、大湖黃南球家，其中霧峰林家在十九世紀晚期竟蛻變為可與林本源家族相匹敵的大家族。

C. 個人研究重點

以清代霧峰林家為主，主要著作為《霧峯林家的興起》、《霧峯林家的中挫》，及預定本年（2023）出版的《霧峰林家的重振》。本研究最大的特色是挖掘大量林家文書，如林家訟案文書，林朝棟文書，並出版《霧峰林家文書集》六冊，²¹ 因此得以大幅補充臺灣史研究的缺口，具創新價值。主要的論點是霧峰林家的族運是驟起驟

出版部，1987）；黃富三，《霧峯林家的中挫（一八六四-一八八五）》（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黃富三，《林獻堂傳》（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

²¹ 黃富三等解讀，何鳳嬌、林正慧、吳俊瑩編輯，《霧峰林家文書集》（臺北：國史館，2013-2017）。

落的：

第一，林家自林石起即在番界拓墾，既犯禁令，又涉及漢番衝突，形成武家族性。

第二，林家發展史上有三大關鍵人物。林石開創拓墾事業而崛起；林文察帶鄉勇赴大陸參與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立下大功而官居福建陸路提督之職，打入官僚階層；林朝棟因抗法有功，臺灣建省後，受劉銘傳重用，協助推動新政顯著，尤其是開山撫番，公私兩利，官居道臺，拓展清廷之山區統治區，且因經營樟腦業而財富猛增，且在漳州、臺中均建有「宮保第」，因此成為研究重點。

第三，清廷治臺基本政策是防止臺灣人坐大抗清，因而出現官紳衝突現象，在林爽文、戴潮春二大亂事中，林家均遭指控涉及叛亂、面臨幾乎抄家滅族之險。

林家族運驟起驟落，就其深層原因，實涉及治臺政策與臺灣作為帝國邊陲小島的歷史宿命，因此個人亦從宏觀角度，分成皇權、官權、紳權間深層的複雜關係，論述其抗衡（confrontation）、妥協（compromise）、合作（cooperation）階段性演變。

2. 臺灣農商連體經濟的商業傳統：「有意栽花」

如果家族史研究是無心插柳柳成蔭，臺灣商業傳統的研究卻是「有意栽花」的結果。記得早年某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有一學者論文宣稱：歷史上臺灣一直是農業社會，直到戰後才發展為工商社會，而且稱其生活型態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等等。我大感驚訝，事實上當時社會上也都流行著臺灣是農業社會之說。

我接臺史所籌備處主任不久，吳大猷院長退休，由李遠哲院士接任，舉辦一場榮退演講會，每所都要提出一篇。我靈機一動，不妨藉此機會發表〈臺灣商業傳統〉一文，也獲得正面反響。接著，臺史所又陸續舉辦「臺灣商業傳統國際研討會」，迄今已舉辦三屆，並出版專書。這是因偶然的刺激而「有意栽花」的結果吧，今天也略抒心得就教大家。

個人發表多篇有關商業、農業的論文，第一，強調臺灣經濟的強烈商業性格，即外貿或市場決定發展的方向；第二，提出「農商連體經濟」論點詮釋自荷蘭時代至1960年代的臺灣經濟發展史。

（1）早期自足式部落經濟：候鳥型外貿

漢人、日人偶然或定期來臺交易，主要至北部採購硫磺、沙金或捕魚，但未落地生根，幾乎船過水無痕，未出現持續性出口產業（sustainable industry）。

（2）荷蘭領臺後出口導向與農商連體經濟的啟動

十七世紀時，荷蘭是世界最先進的海權國，1602年東來印尼，設立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nnigde Oost-indie Compagnie），經營東亞貿易；1624年佔領臺灣後，引進當時流行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因而啟動了臺灣的重商傳統與農商連體經濟。首先，荷蘭人在今日安平建商館，發展國際轉口貿易。當時東亞最具價值的商品是中國的絲、日本的銀、南洋的香料，臺灣位於三地之中央，位置適當，乃以之為轉口貿易的據點。²²

其次，荷蘭人進一步發展農業，並與貿易結合，引導臺灣走向經濟成長之路，創造一農商連體之經濟型態。荷蘭人定政策，漢人執行，分工合作，共同打造出一個新臺灣。²³

荷蘭人發展臺灣農業是因應當時貿易環境之變化而採取之對策。因原本轉口絲綢、香料至日本的貿易因不敵鄭芝龍華商集團的競爭，但蔗糖乃具有國際市場的農產品。1630年代開始，荷蘭人明智地採取獎勵華人至南部平原種植甘蔗、製造蔗糖。結果土地開墾面積不斷增加，在1645-1657年間，從2,486 morgen（摩亨，等於一甲）增至8,070.2 morgen。²⁴ 甘蔗園的面積不斷增加，在1645-1657年間，蔗園的面積從612 morgen增加至1,688 morgen，將近三倍；至於年產量，從15,000擔增至20,433擔。²⁵ 又據研究，臺南附近之砂糖產量由1636年之1,244擔激增至1658年之17,300擔，產量超過爪哇，並取代鹿皮成為主要出口貨。²⁶

²² 曹永和，〈環中國海域交流史上的臺灣和日本〉，收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1-36。另外，印度的棉布亦很重要，但與臺灣較無關係。

²³ 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222-240。

²⁴ 韓家寶（Pol Heyns）著、鄭維中譯，〈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臺北：播種者文化公司，2002），頁103。

²⁵ 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181。

²⁶ 曹永和，〈荷蘭與西班牙佔據時期的臺灣〉，收於林熊祥等著，《臺灣文化論集（一）》（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頁119。

蔗糖外銷市場先是日本，後有波斯等地。²⁷ 在 1633-1659 年之 26 年間，輸往日本之砂糖從 7,506 斤增至 602,065 斤，激增 80 倍強，金額從 325gulden 增至 76,713 gulden，激增 236 倍。²⁸ 輸往波斯之砂糖，1639-1651 年之 12 年間，從 188,000 斤增至 463,557 斤，增幅為 2.4 倍。²⁹ 最後，二地平分秋色，約各占一半之臺糖外銷量。

再者，由於漢人移民之大增，造成糧食供之緊張。初期通常需自日本、暹羅（泰國）進口稻米，³⁰ 每年需花不少經費。因此，公司從 1630 年代中期後，亦鼓勵漢人移民種稻，糧產漸增而能自給。1642 年，產量約達四千擔，至遲在 1656 年已有餘米可出口。³¹ 唯大體上，稻米主要是做為糧食，並非為出口而發展之農產品。

自 1630 年代臺灣農產迅速發展後，以糖為主的農產品與貿易相互結合，此一模式可稱為「農商連體經濟」，主導日後三百多年之經濟發展方向。³² 從此，臺灣不再只是外人短暫來訪僅做物物交易之地，而開始進入以本島為基礎之經濟主體，並由東亞孤島蛻變為世界島。

（3）後代之傳承農商連體經濟

1661-1662 年，鄭成功驅退荷蘭人統治臺灣後，基本上傳承重商政策與農商連體政策。唯在農業方面，雖仍以糖為主要貿易品，但較荷蘭時期更重視稻米的生產，此與當時之歷史背景與鄭氏王朝之軍國主義政策有關。

1683 年，滿清統一臺灣時仍然傳承。原因是糖是國際商品，市場比米大。清朝統一臺灣後，康熙 23 年（1684）開海禁，每年有銷往日本之配額是二萬石，掌控運銷權的就是平臺功臣施琅，其遠親施秉移居臺灣鳳山，出口蔗糖至日本，獲

²⁷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之臺灣農業及其獎勵〉，收於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臺北：稻鄉出版社，1997），頁 70。

²⁸ 永積洋子著、劉序楓譯，〈由荷蘭史料看十七世紀的臺灣貿易〉，收於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輯·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頁 51。

²⁹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之臺灣農業及其獎勵〉，頁 70。

³⁰ 曹永和，〈荷蘭與西班牙佔據時期的臺灣〉，頁 40；中村孝志，〈荷蘭時代之臺灣農業及其獎勵〉，頁 48。

³¹ 東印度公司原著，村上直次郎原譯，郭輝中譯，王詩琅、王世慶校訂，《巴達維亞城日記》（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第 2 冊，頁 233。

³² 黃富三，〈17 世紀臺灣農商連體經濟的啟動〉，收於陳益源主編，《200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9）。

得厚利。³³ 康熙 36 年（1697）來臺採硫磺的福建官員郁永河指出，臺灣「植蔗為糖，歲產五、六十萬石，以貿日本、呂宋諸國」。

然而，十七、十八世紀之交後，臺灣稻米產量大增，成為與蔗糖並重甚至超越的主要出口品。從需求面講，十七世紀末葉，大陸人口迅速增加，缺糧問題日益嚴重，尤其是福建，因此有一個日益擴張之稻米市場。其次，臺灣移民大增，1683 年清統一時，據估計約有 12 萬漢人與 20-30 萬原住民，至 1895 年，高達 250 萬人，因此島內糧食需求亦大增。

漢人最擅長的是水稻精耕農業，施世榜是先驅，他率先興建清代第一大水利工程：八堡圳，從而啟動水田化運動。康熙 48 年（1709），他率先至彰化平原，利用濁水溪水源，於康熙 58 年（1719）完成八堡圳，不但墾地擴大，土地租額亦大增，有圳水灌溉，每甲增高一倍以上，達八石之多。³⁴ 施家因而頓成臺灣巨富與地方重要領袖。八堡圳建成之後，由南而北興起水圳熱與水田化運動，稻米產量大增，超越蔗糖成為最重要出口貨。

兩岸因而貿易興盛，康熙末年，藍鼎元稱，臺灣「糖、穀之利甲天下」，在 1860 年開港前，商業已成農業之外的另一重要經濟支柱。道光年間，臺灣道臺姚瑩即指出「臺民生財之道，一曰樹藝，一曰貿遷」。

然而，十八世紀後半葉以來，從英國開始的工業革命產生工業資本主義，它亟需市場消化其產品，亦需進口所需之原料及外國新商品。清帝國在 1842 年開放五口通商，臺灣亦在 1858-1860 年開放通商，傳統的農商連體經濟受到挑戰，臺灣又因獨特之地形、氣候，山區樟腦、茶之特產，吸引外商設立洋行採購。

樟腦之需要量雖不大，但因用途廣泛，可以防蟲、燻蓆、製香等，後來甚至是製造無煙火藥、賽璐璐等的原料，具有世界性市場。臺灣盛產樟木，可熬製樟腦，具有極大的發展潛力。英國人早在道光 18 年（1838）3 月，已運鴉片至雞籠交易樟腦；閏 7 月又到滬尾，停泊六個月之久。英商怡和洋行亦在 1855 年 7 月，在梧棲賣出鴉片，而購入米、樟腦、樟木等。當時世界上只有臺灣、日本生產樟腦，成為半壟斷性的商品，而臺灣是最大的供應地。樟腦產地主要在中、北部，

³³ 黃富三，《臺灣水田化運動先驅施世榜家族史》（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頁 13-14。

³⁴ 張素珍，《歷史視野中的地方發展與變遷：濁水溪畔的二水、北斗、二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4），頁 107。

散布於大嵵崁溪、大甲溪、鳳山溪、後龍溪之內山，甚至遠至埔里、噶瑪蘭等地。1870年代，熬腦規模已甚大，以致於山區光禿。出口則激增，1864-1895年，出口量自1,171,464磅增至6,935,285磅，增幅近6倍。每擔價格自8元增至40元以上，1895年，高達68.5元，達8倍以上，獲利驚人，故金額自70,464元激增至3,571,932元，增幅近50.7倍。

茶業亦繼之而起。西方人飲茶風由荷蘭人引進歐洲，再傳英國，逐漸普及於全世界。1860年代臺灣開港後，臺茶快速發展。John Dodd是拓展臺茶外銷的功臣，他在1865年至淡水考察商務，見文山、海山堡茶樹叢生，土性、氣候均佳，1866年攜帶安溪茶苗來臺，並貸款農民栽培、製作，1867年運銷澳門，大受好評，1868年在大稻埕設廠製造，創出Formosa Oolong品牌，其後又直銷美國，其它洋行亦急起直追，競相購買茶葉外銷。³⁵因此，原本種植大藍的山區紛紛改種茶樹，1863年後，大稻埕四周山區由種大藍改種茶樹。³⁶

臺茶外銷好，1866-1895年間，烏龍茶價格由13,596銀元激增，1869-1870年，由98,693元至359,261元；至1879年高峰之3,992,070元，至1894年，達到6,907,363元，³⁷因此取代福建茶成為最受歡迎的茶葉，量價均超越，³⁸成為樟腦之外另一高獲利新商品。

3. 結語：臺灣人悲哀嗎？

臺灣在政治史上不斷換老闆，是臺灣人的悲哀。然而，臺灣在不到四百年內由部落社會蛻變為今日的高科技文明社會，原因是外來統治者離開後，也留下其遺產成為臺灣的資產。十九世紀後，香港在英國統治後成為東方之珠，臺灣今日

³⁵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5), pp. 273-374; 黃頌文,〈清季臺灣貿易與寶順洋行的崛起(1860-1870)〉,《臺灣文獻》(南投) 61:3 (2010年9月),頁146。

³⁶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晚清臺灣》(臺北:臺灣銀行,1978),頁59;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1867-1881》(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總頁340(1878,淡水,頁211)。

³⁷ 黃富三、陳慈玉,〈商業的發展〉,收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近代史·經濟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頁333;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 442;東嘉生,〈清代臺灣之貿易與外國商業資本〉,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初集》(臺北:臺灣銀行,1954),頁112。

³⁸ 陳慈玉,《臺北縣茶業發展史》(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頁22-23。

則已蛻變為東亞鑽石，甚至光耀世界，³⁹ 有可能取而代之。

（三）施添福，〈空間、歷史與地域社會〉

1. 緒言

我是在純屬偶然、因緣巧合的狀況下，走進臺灣歷史地理的研究領域，常自嘲是種瓜得豆。同樣的，我也是在一系列因緣巧遇下，才開始使用「地域社會」取代地理學中區域研究傳統的「區域差異」或「區域變異」方法論，來觀察和分析傳統社會。回顧起來，這真是一段雖然漫長卻充滿活力，既辛苦又快樂的探索學習旅程。

2. 地域社會：是研究的實體，也是分析的觀點

正式踏入臺灣歷史地理的研究領域，始於竹塹地區的聚落田野調查；當時，我的企圖是：「從歷史發展過程中，尋找影響聚落分布形態的各種要素及其關聯性，以解釋聚落分布形態的特殊性。」換句話說，我是懷著地理學中區域研究傳統的分析性概念工具，即「區域差異」或「區域變異」，進入田野，藉以觀察現象。從竹塹地區、蘭陽平原到鹿港草地的聚落研究，儘管分析方法和使用史料有所不同，但這種調查的角度，分析的觀點，基本上沒有改變。⁴⁰

然而，在聚落的田野調查，以及隨後一系列點、線到平面的空間分析過程中，讓我逐漸體會到聚落的分布形態，似乎和聚落的社會組織與運作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有必要將區域內由居民點和聚落組成的社會——或稱「地域社會」，納入視野，進行整體的觀察和分析。這也是我在鹿港研究後，以地域社會取代聚落作為研究實體的理由之一。

地域社會，取代的不僅是研究實體的名稱，也是一種研究觀點的轉化。2000年左右，為了撰寫一篇討論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論文，我曾為地域社會寫下

³⁹ 黃富三，〈世界史中的臺灣史：學術生涯回顧〉，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頁565。

⁴⁰ 關於竹塹、宜蘭、鹿港的研究，見施添福，〈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立文化中心，2001）；施添福，〈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上、下冊）〉（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6）；施添福，〈清代鹿港地區聚落的血緣結構：以家族史料的建立為例〉，發表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合辦，「臺灣史研究暨史料整理成果研討會」（1998年6月1日）。

一段暫時的定義，即「以一定空間範圍為基礎，建立和維繫人群關係的社會，或稱『土親』社會」。⁴¹

這個定義，今日看來，顯然失之簡略、籠統。不過，其後在東部關山、北部內山的卓蘭、苗栗和三灣等地進行的田野調查和研究，讓我對清代的地域社會，有了更清楚的理解。因此，我深覺有必要再度為地域社會的研究觀點提出說明如下：「從歷史發展過程中，探究一定空間範圍內，社會關係網路的發展及其整合的機制，以闡釋歷史上臺灣社會性質的區域變異性」。

到目前為止，根據我的理解，地域社會本身的整合，基本上是通過「地緣」、「血緣」以及「語緣」等關係聯結而成；而這些社會關係的建立，又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實踐「維生」、「信仰」、「宗族」和「姻親」等四類價值觀（領域），而逐漸形成社會關係網絡（見圖四）。⁴²

在時間的限制下，我無法提供進一步的論據。為彌補缺憾，姑且從同一個研究區中舉出兩個姓名為例，稍作補充。第一個姓名叫吳袁曾鼎松，第二個稱為宋湯林。前者姓名中的前三個字，分別代表三位祖先的姓：袁是 17 世，吳是 18 世，而曾是 19 世祖先，本人則是 20 世；後者的姓名，表面上看來，有姓又有名，其實這三個字也是分別代表三位祖先的姓：湯是 18 世，宋是 19 世，林是 20 世祖先，而本人從原鄉算起則是 21 世。前後兩個姓名的祖先，既無血統、血緣的直接關係，也沒有原鄉的地緣關係；前者的袁是鎮平人，吳是永定人，曾是武平人；而後者的湯是鎮平人，宋是陸豐人，而林則是饒平人。他們之間，唯一的共通點是：都講腔調略有差異，卻溝通無礙的客家語（或稱客語）。看來，從 17、18 世到 20、21 世，他們在地域社會的日常生活互動過程中，已經跨越了血緣、原鄉地緣的羈絆，而以語緣和新鄉地緣作為紐帶，建立了彼此認同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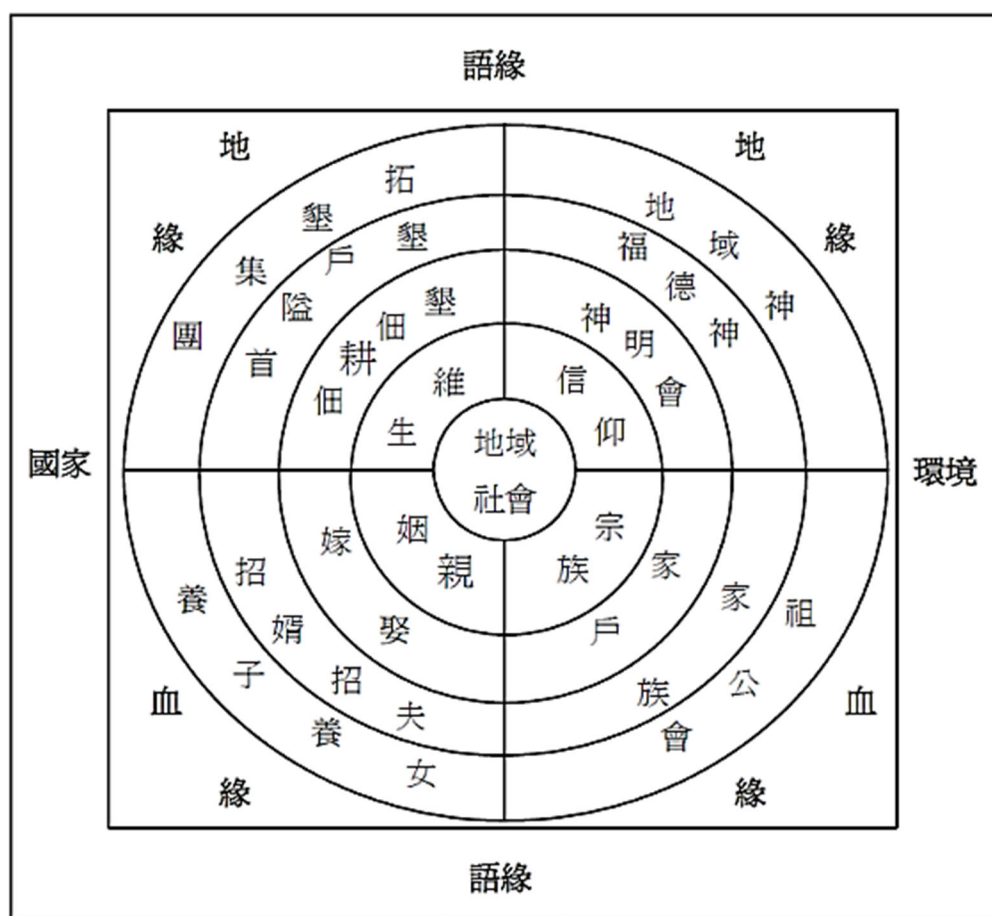
兩個姓氏的特殊性，固然蘊藏複雜曲折的家族生命史；但是，能夠如此成全傳宗接代、繁衍子孫的願望，卻是地域社會共同認可的「抱養子女、招婿招夫」做法。而這種取姓的方式，沒有引人側目，甚至排斥，證明他們生活所在的地域

⁴¹ 施添福，〈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臺灣史研究》8: 1（2001 年 6 月），頁 3。

⁴² 施添福，〈社會史、區域史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北部內山的研究方法論為中心〉，《臺灣風物》68: 3（2018 年 9 月），頁 91-114。

社會，也認同這樣的苦心：「為了不忘祖先，想方設法，成就傳宗接代的恩惠，因時制宜，將沒有男性子孫傳承的祖先姓氏，一齊背在自己的身上，期望未來能繁衍更多子孫，承擔慎終追遠的責任」。結果呢？皇天不負苦心人，兩者長大娶妻，如願各自生育三個男兒，分別以祖先的姓為姓，各自將後代還給祖先，既安慰了祖靈，也讓家族的發展邁入新紀元。

歷經五個世代的整合，吳、袁、曾，宋、湯、林等姓的後代子孫，終於在地域社會成為道地的臺灣客家人。



圖四 清代臺灣地域社會研究模式

說明：本圖與 2018 年刊出的〈社會史、區域史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北部內山的研究方法論為中心〉文中附圖略有不同，反映研究概念的階段性變化。

資料來源：施添福，〈社會史、區域史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北部內山的研究方法論為中心〉，頁 108。

3. 空間、國家與地域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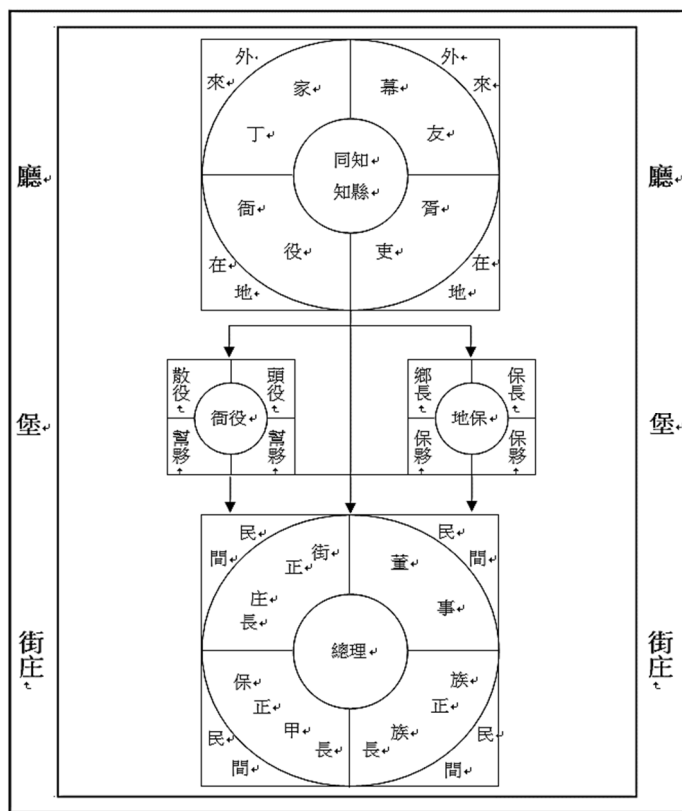
我曾經說過：「國家和社會秩序皆仰賴空間秩序，才得以順利建立和運作。」也因此，我一直強調：「一定的空間範圍，是設定地域社會的前提。」分疆劃界所形成的一系列空間系統，既是地域社會用以劃分權利和義務，區分我群與他群，消彌紛爭，維持社會秩序，進而孕育地方感、歸屬感、認同感等鄉土意識的載體；也是國家掌握領域，治理地方和控制社會的手段。所以，《周禮》（戰國或西周）說：「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或葉春及的《惠安政書》（明）也說：「惟皇制治，建府制縣，劃鄉分里，以奠民庶」，講的應該就是這種現象。

中國王朝國家向來採取「以地統人」的統治技術，即先劃分土地（區域、空間），再組織土地上的人戶，這就是有「土地之里」，也有「人戶之里」的由來。這種治術，行之日久年深，遂使鄉治系統具有雙重性格：既是空間，也是社會的一體兩面性。劉淇〈保甲論〉（清）說：「天下非一人所能理，於是有省、有府、有州縣；州縣亦非一人所能理，於是有鄉、有保、有甲。」陸世儀〈論治邑思辨錄〉（清）也說：「治天下必自治一國始，治一國必自治一鄉始，治一鄉必自五家為比、十家相聯始。」兩者所提到的鄉，是土地（區域、空間）劃分，而其餘則是人戶組織。由此可見，「地域—人戶」或「空間—人群」上下相維的傳統，由來已久。地域社會的兩面性，若去除其一，難免變成「有魂無體」或「有體無魂」（見圖五）。

到了日本時代，地域社會的雙重性格更加明顯。殖民政府透過土地調查，繪製堡圖和地籍圖，釐定大、小字的空間範圍，進而製作土地臺帳和戶口調查簿，並將地籍上的「地番」轉化為戶口的「番地」，而使「地與人」或「地籍與戶籍」統合成一體。日本殖民政府，基本上，就是通過「以圖統地」和「以地統人」的「地和人」合一統治手段，治理、操控和改造臺灣的地域社會。⁴³

在臺灣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地域社會內部各種社會關係的整合，很難擺脫國家，以及環境的深刻影響。然而，由於其所在的區位和所處的時代有異，國家和環境的影響方式、程度，也會有所不同。日久年深，各地的地域社會，亦將逐漸呈現各自的特殊性。社區營造、城鄉風貌所要突顯的，或許就是這種特殊性吧！

⁴³ 施添福，〈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頁4-6。



圖五 清代臺灣地方性權力空間配置模式

資料來源：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從中國歷史上的鄉里制度談起〉，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第二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暨施添福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年11月12-13日），頁2。

4. 田野調查與地域社會

我對地域社會的觀點，其實是成形於田野調查和史料解讀等實證研究；雖仍殘缺不全，但相信有助於深耕臺灣歷史地理研究，進而建構一套較為完整的分析性概念體系。當然，我的田野調查和史料取得，若非生逢臺灣的公務機關和學術機構，對典藏的文獻史料，從保守而日趨開放的「盛世」，恐怕一切苦勞，也將化為白工。

以研究臺灣歷史地理為目的而下田野，始於竹塹地區的調查。⁴⁴ 1986年8

⁴⁴ 竹塹研究最初的成果，見施添福，〈臺灣歷史地理研究筭記（一）：試釋土牛紅線〉，《臺灣風物》39:2（1989年6月），頁95-98；施添福〈臺灣歷史地理研究筭記（二）：竹塹、竹塹埔和「鹿場半被流民開」〉，《臺灣風物》39:3（1989年9月），頁73-82；施添福，〈清代竹塹地區的「墾區莊」：萃豐莊的設立和演變〉，《臺灣風物》39:4（1989年12月），頁33-70。

月，在故張光直院士的大力推動下，成立「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並鼓勵跨學科的臺灣史研究。為響應張院士的號召，三民所（後改稱社科所）的張炎憲（歷史學），邀請莊英章（人類學）和我（地理學），共同提出：「清代竹塹地區漢人聚落發展與土地租佃關係」的研究計畫，由我負責聚落發展的田野調查。1988年夏季，日頭炎炎下展開田調，隨身攜帶的只有兩種地圖：堡圖和航照圖。我也只好按圖翻山越嶺、走村串鎮，觀察、記錄各色各樣的聚落型態。若非後來在偶然間，找到土牛溝，以及張炎憲透過社科所，自國外購入全套《淡新檔案》微捲，並允許我於上班時間可以入內閱覽及複印，我無法想像竹塹地區的聚落發展研究，將如何收尾。這次的田調，不但讓我認識聚落型態的區域變異性，更深刻體會空間界限的人文歷史意義。

歷經上述田野調查和史料解析的探索學習之旅，我開始注意國家、環境以及語緣對地域社會整合和分化所起的深刻影響。因而，企圖將其納入研究視野。此係後話，不再深談，我的報告，就此結束。

表二 田調找到的史料和分析重點

調查地點	調查時間	主要史料	分析重點
竹塹地區	1988-1990	堡圖、淡新檔案	聚落的點線面、分布形態及其區域差異性
蘭陽平原	1994-1996	日治戶口調查簿：現戶索引（全部可複印） 地籍圖（複印聚落部分）	1.聚落分類系統 2.街庄社及土名，市街庄和大小字的演變 3.小字的姓氏分布、聚落類型和圖示 4.以圖統地、以地統人的原則
鹿港草地	1996-1998	地籍圖（複印聚落部分） 土地臺帳（抄錄） 戶口調查簿：現戶、除戶（進入事務所抄錄） 公媽牌、忌神簿	1.聚落的形態 2.聚落的血緣結構 3.家族發展史
關山地區	1998-1998	地籍圖、土地臺帳（全部複印） 戶口調查簿：現戶、除戶；本籍、寄留（全部複印）	1.土地所有權轉移 2.人口移動速度 3.族群間婚姻關係 4.地域社會穩定度
卓蘭地區	2002-2003	地籍圖（全部複印） 戶口調查簿（全部複印） 公文類纂、族譜	
三灣-銅鑼、苗栗地區	2003-2006	地籍圖、戶口調查簿（全部複印） 墓碑、墓記、日治土地申告書	地域社會內部原鄉地緣、血緣等各種社會關係網絡的建立、整合和分化

資料來源：施添福整理

四、第三場次：跨學科對話的實踐



圖六 第三場次

說明：左起為曾文亮、陳偉智（主持人）、林文凱、吳叡人。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提供。

（一）吳叡人，〈漫長的返鄉〉

我是政治學博士，但我的知識背景比較複雜，除了政治學，也涉及了哲學和歷史，這跟我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所接受的訓練有關。事實上，我在芝加哥的訓練，其實已經為日後與臺史所相遇做了準備。我當年出國求學的主要目的是想要理解、解釋臺灣認同的形成，同時為臺灣認同辯護。為了達成這兩個目標，我經歷了漫長的摸索過程，因為我的眼前沒有既成的道路，沒有前人留下的航海圖，必須自己找路。

在這過程中，我經歷了至少三種學科的養成過程。第一種學科是比較政治學（comparative politics）的理論和方法訓練，具體內容包含了社會科學的幾個古典課題：1. 經由複數個案的比較找出規律、通則和模式；2. 事件與行動的因果解釋；3. 概念化。在這個部分，我受到 Raymond Aron 的學生 Jon Elster 影響很深，形成了韋伯主義的（Weberian）社會科學思考傾向。比較政治的取徑很重視歷史，因為歷史提供了比較研究最重要的經驗素材。在此意義下，比較政治與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頗有相通之處，後來社會學家 Theda Skocpol 統稱此類

取徑為「比較歷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第二種學科是西洋政治哲學與政治思想史訓練。我在芝加哥受到的主要是史特勞斯學派 (Straussian School) 的古典政治哲學與文藝復興以後現代政治哲學的訓練，另外在原任教於法國 *Sciences-Po* (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 巴黎政治學院) 的法籍老師 Bernard Manin 指導下研讀十六世紀蒙田以來的法國 *moralistes* 著作，以及十八世紀歐洲浪漫主義哲學家盧梭和赫德的思想。西洋政治思想史研究重視多語歷史文本的深度解讀和詮釋，以及規範性的政治研究，目的在學習如何為政治主張辯護或正當化 (justify politics)。

第三種學科是世界史或全球史的視野。我很早就體會到研究臺灣認同形成必須採歷史取徑，而且不只是臺灣歷史，而是比較史 (comparative history) 的取徑，因為臺灣歷史自身是在多重外部影響之下形成的。當時我因修習比較政治學，大量涉獵了西洋近現代政治史、日本史 (主要從日裔美籍ナジタテツオ教授)、中國史 (隨印度籍杜贊奇教授)，臺灣史則是完全自學。由於我最初學習歷史的動機是想做比較歷史分析，所以尋找通則和模式、類型的傾向較強，但時日一久，不知不覺形成了某種全球史視野，後來經過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教授提點「要時刻站在奧林帕斯山頂觀看」之後，才意識到自己的比較史分析與當代所謂全球史取徑確有會通之處。

上述長期摸索、累積的知識背景，最終匯聚在我的芝大博士論文〈The Formosan Ideology (福爾摩沙意識形態)〉之中。⁴⁵ 這篇論文至少包含了三重的研究：第一，臺灣民族主義興起的個案研究 (包含其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第二，日本殖民統治與歐洲式殖民統治的比較研究；第三，日本帝國內反殖民民族主義的比較與類型化 (臺灣、朝鮮、沖繩)，以及此種類型和歐洲帝國殖民地所發生之民族主義的比較。此外，它也是一部日治時期臺灣政治思想史的實證研究，不過我在實證研究中歸納出一種我稱之為「雙重邊陲的抵抗」的意識形態特徵，因此可說也包含了某種對臺灣民族主義思想的批判性辯護。如今重新回顧、整理，我發現這部

⁴⁵ Rwei-ren Wu, "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PhD.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3; 吳叡人著，梅森直之、山本和行訳，《フォルモサ・イデオロギー：台湾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勃興 1895-1945》(東京：株式会社みすず書房，2023)。

博論大體上已經包含了日後我在臺史所研究的幾個方向的原型：1. 臺灣政治史（民族國家形成過程）；2. 臺灣政治思想史；3. 比較殖民主義；4. 比較民族主義；5. 後殖民批評角度的臺灣歷史評論。要等到進了臺史所，在真正專業歷史學研究的環境中，上述種子才逐一發芽。

我在芝加哥發展出來的社會科學與哲學的歷史傾向長處在於，社會科學、哲學等跨學科知識提供了梳理複雜歷史現象的有用工具（如規律、類型的尋找、概念化等）。要理解社會現象我們無法逃避概念化，重點在合理的概念化。哲學概念則可以幫我們掌握思想、價值與情感等非物質的歷史現象的意義。概念無法取代真實，但能協助我們梳理、逼近真實。此外，比較史的知識可以擴展視野，閱讀多語歷史思想文本的經驗則提高對任何語言文本的理解能力。不過我必須強調，這些畢竟都不是「本格」的史學，最終我還是要等進到臺史所以後才首度接觸專業史學研究，然後社會科學、哲學與專業史學的歷史視野才獲得融合的機會。

臺史所給了我甚麼影響呢？首先，臺史所給了我完全自由發展的空間，讓我得以盡情實驗前述多學科的視野融合。其次，初入所時所內前輩「你今後要為臺灣年輕世代而寫」的叮嚀，讓我放棄長期以英、日文寫作的習慣，專心以中文書寫。這是一個選擇，我沒有後悔。第三是來自「本格派」專業史學的影響。我永遠學不會專業史家找史料與整理史料的功夫，但我深深受惠於他們找出、整理的史料，也從他們那裡學會重視史料的態度，理解了史料的複雜性與解讀的困難。借用劍橋學派思想史家 Quentin Skinner 的話來說，必須先突破史料的形式歷史性，才談得上深度解讀。專業史學家對史料「真劍」的態度，絕不是臺灣號稱搞歷史的社會科學家所能理解。

更具體而言，臺史所對我在知識發展上留下了深刻的影響。首先，我逐漸體認到實證史學研究成果和史料對經驗理論建構的重要性：史料和實證研究是理論建構的基礎條件；實證史學可以制約過度的理論化；傑出實證史學成果的「史識」洞見對社會科學理論建構具有啟示性。事實上 1950 年代美國社會學家 Robert K Merton 已有 middle range theory（中程理論）之說，⁴⁶ 1990 年代以來社會科學哲學發展，更進一步意識到大理論（grand theory）或一般性理論（general theory）

⁴⁶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的困難，轉而主張局部性或區域性理論（local theory），乃至托克維爾式的多重因果解釋機制論，⁴⁷ 而這些看法和史學是有會通之處的。（對我個人而言，主要的理論企圖則是想尋找歷史行動的區域性模型，例如日本的東方式殖民主義，或者東北亞海洋邊陲民族主義、國家形成模式等。）以上所述也可適用在思想史文本的詮釋上：堅實的文本史料既是一切詮釋的基礎，同時也可制約過度擴張的詮釋。最後，來到臺史所這段時間，我逐漸發展出一種以實證史學研究成果為基礎的規範性歷史評論文類，這種寫作也是我對當代許多專好對大問題任意發言，卻不重視基礎實證研究與理論訓練，空把個人意見妝點為理論的後殖民、文化研究的惡習者之警示與批判。

在所內前輩和同仁的寬容與指導下，我在臺史所中經驗的跨學科對話是正面的，而且有一定的成果產出。大體上我摸索出三個知識方向：1. 臺灣政治史的詮釋架構，底下包含三個子題——民族主義發展、臺灣國家形成、國家暴力與轉型正義。2. 臺灣政治思想史：在只有眾多斷裂的小文本，沒有主要大文本的既有條件下，透過比較與結構性閱讀的方法，描繪出一個「臺灣思想史」的輪廓。此外，再從思想史研究衍生出一種「史論」的文類，亦即不只對歷史現象進行重建、解釋，也做評價。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收在《受困的思想》文集之中。⁴⁸ 3. 比較史／全球史／帝國史視野中的臺灣史，主要涉及近現代的日本、沖繩、朝鮮與香港。這個方向的出現，部分是當代東北亞政治史驅動的不預期後果（例如沖繩、香港研究），並非自己的規劃，所以我也可說是一個「意外的全球史實踐者」（an accidental practitioner of global history）。整體而言，我的經驗告訴我，只要我們抱持開放的態度，嚴格遵循各學科的專業知識規範，跨學科對話對於臺灣史研究是非常正面的。

最後，請容許我做一個簡單結論。我為了認識臺灣而離開臺灣，走向世界，從政治學走向哲學，再從哲學走向歷史，而且是從世界史走向臺灣史。離開芝加哥之後在早稻田繞了一點路，最終又從世界返回臺灣，這時候整個臺灣只有一個地方容得下我這個雜種、混血、不接受學科體制規範的人，那就是中研院臺史所。

⁴⁷ Jon Elster,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First Social Scientist*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⁴⁸ 吳叡人，《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新北：衛城出版，2016）。

而今天聽了阿娟（詹素娟）的臺史所史前史，才體會到臺史所的起源原本就是跨學科的臺灣研究，所以，在知識地圖繞了一大圈，我只是回到原點而已。於是我才理解，臺史所對我而言，原是一段漫長的返鄉。

（二）林文凱，〈從社會學到歷史社會學：我的臺灣史研究的來路與進路〉

今天我主要從跨學科研究者的角度來談社會學與歷史學的關係，算是交代我的臺灣史研究的來路與進路。⁴⁹ 報告主要將分成三個部分：首先，從我的學習與研究過程來說，我的歷史社會學如何定位社會學與歷史學的關係；其次，我的社會學思考如何刺激與引導我的臺灣史研究，反省社會學或者社會科學的思考訓練，對我從事各階段臺灣史研究議題的啟發與影響；其三，以我自己臺灣史研究的經驗，參照目前臺灣社會學界的歷史社會學的教學研究現況，來反省檢討目前臺灣社會學研究某個程度上「缺少歷史化」或「不夠本土化」的一些困境。

首先，說明我的臺灣史研究來路，如何從社會學理論的訓練轉變成歷史社會學的學習，以至於成為研究清代到日治時期臺灣社會變遷的臺灣史研究者。我在研究生與博士班階段所學其實是西方社會學理論，主要閱讀與分析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奠基者如馬克思（Karl Marx）、涂爾幹（Émile Durkheim）、韋伯（Max Weber），與當代社會學理論的學者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傅柯（Michel Foucault）、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的社會學經典著作，而社會學理論其實就是現代性理論，即從不同的取徑觀點討論西方社會從傳統到現代變遷的歷史過程，因此這些社會學理論的討論也都是歷史社會學，他們也都被

⁴⁹ 有關臺灣社會學界對於社會學與歷史學關聯的學術反省，柯志明已有幾篇從跨學科歷史研究方法論角度著眼的論文，值得參看。參見柯志明，〈歷史的轉向：社會科學與歷史敘事的結合〉，《臺灣社會學》（臺北）10（2005年12月），頁149-170；柯志明，〈跨學科的歷史研究法〉，收於瞿海源、畢恆達、劉長萱、楊國樞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臺北：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211-239；柯志明，〈臺灣社會變遷研究的歷史轉向：對整體觀與貶抑歷史敘事的一點反思〉，《臺灣社會學刊》（臺北）63（2018年6月），頁1-62。筆者博士論文研究階段從社會學理論轉向歷史社會學的研究過程，受到柯志明的指導與研究教示的影響，有關歷史研究方法論的想法也基本服膺其觀點，不過本文的反思不涉及歷史研究方法的討論，主要僅從筆者個人關切的近代早期以來臺灣史和東亞史與世界史的相互關聯與交互比較的角度，申論臺灣的歷史學與社會科學跨學科研究的必要性。

認定為是歷史學者，或深刻影響了西方歷史學研究。進一步來說，在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裡，這些社會學者並沒有單一的學科身分，他們同時被認為是哲學、政治學、經濟學與人類學的研究者，或影響這些學科的發展。所以我的訓練養成過程使我有一種跨學科的認識，了解到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之間的密切關聯，儘管我也了解二十世紀學術發展下，因學術體系分化與制度化過程，導致這些學科的研究取徑與知識呈現上有異同之處。

另一方面，這些學者雖然以西方社會變遷為主要觀察對象，但他們的理論視野都明顯是涵蓋非西方的東方社會在內，而被二十世紀初以來東亞各國創設新史學的歷史研究者們，運用在其自身東亞社會變遷的研究上。當我閱讀這些歷史社會學研究，基於對於臺灣社會變遷的研究關切，自然也會思考如何參照這些西方社會學理論來進行臺灣社會研究，而因著眼於社會變遷的討論，因此我的臺灣社會研究就是歷史社會學研究，同時也必然是「臺灣史研究」。然而實際把西方理論觀點應用在東亞或者臺灣社會的歷史研究上，會出現一些扞格不入的問題，而必須以東亞或臺灣歷史研究來與西方既有理論觀點進行對話與修正。

在博士班階段，我偶然選修了從事歷史社會學研究的柯志明老師之「清代到日治時代臺灣社會經濟變遷」課程，且在期末報告選擇以清代淡新檔案的土地糾紛為題，而後以這個主題展開我的清代臺灣史研究。由此因緣，我從之前的社會學理論或文化社會學研究者，轉型成從事臺灣史研究的歷史社會學者，並成為中研院臺史所的臺灣史學者。

接下來，簡要交代我的社會學或者社會科學觀點，如何影響與助益我各階段的臺灣史研究，藉以說明在充分掌握歷史學研究技藝與既有研究的前提下，若能適度依照研究議題參照一些社會科學的理論觀點，也許在從事臺灣史研究時會有一些問題意識或研究取徑上的啟發。

首先，以我的博士論文為例，在我從事淡新檔案土地訴訟的研究時，我注意到國際清代法律史學界 1990 年代以來的一個學術辯論，即滋賀秀三、黃宗智等人有關清代民事聽訟的審理邏輯辯論，這個辯論還涉及寺田浩明與岸本美緒等人從文化史角度展開的中國法律文化或法秩序的辯論。簡言之，滋賀秀三與黃宗智主要是從法律來論法律，試圖通過淡新檔案等法律文書的言說表達來討論官員處

理民事爭訟的審理邏輯；而寺田浩明則從中國文化史或文化類型論的角度（明清歷史變動會不見了），來討論官員爭訟解決邏輯背後的文化秩序觀。

有意思的是，這些學者都以淡新檔案的訴訟文書來作為其所提出的理論觀點之史料依據，但他們的分析僅以淡新檔案等訴訟文書為依據，缺少針對臺灣社會史的充分掌握，無法有效掌握淡新檔案中的土地訴訟的發生脈絡，與審理過程中更大的社會史脈絡。我的社會學理論訓練提示我，法律無法自外於國家與社會，文化運作也不能自外於制度脈絡，因此我參照西方的法律社會學的研究取徑，發展一種兼具制度論與文化論雙重取徑的地方法律社會史的研究取徑，關照清代國家與社會互動的多重關係，以及清代政治、經濟與法律活動的制度性關聯，從而以法律社會史的整體性視角對清代土地法律文化作出完整詮釋。當然還應提到的是，我在從事淡新檔案的研究時，係因有施添福、邵式柏與柯志明的熟番地權研究成果，及其他清代臺灣社會史研究成果作為依據，讓我可以參照來從事地方法律社會史的法律文化分析。⁵⁰

其次，有關我的清代臺灣米穀輸出史研究，由於清代到日治的米穀輸出是臺灣經濟史重要的一環，我在閱讀臺灣經濟史的文獻時，注意到兩個經典作品間的對立表述：林滿紅的茶糖樟腦與晚清臺灣社會變遷的經典作品，依據清代海關統計資料，主張十九世紀中葉開港後臺灣米穀輸出大減而不再是重要輸出品；歷史社會學者柯志明有關米糖相剋的日治臺灣經濟史作品，則依日治時期的統計指出臺灣在日治初期前十年的米穀出口佔臺灣對外輸出重要地位，地位僅次於茶，甚至高於糖與樟腦。我從這個矛盾出發，透過歷史制度論的方式分析清代海關與日治時期海關統計制度的差異，指出林滿紅誤解了清代海關統計的內涵，實際上的晚清臺米輸出方式與茶糖樟腦等國際性商品不同，開港後臺米仍是重要的出口商品。⁵¹

與此相關的是開港之前的臺灣米穀輸出問題，我注意到包括王世慶、栗原純、

⁵⁰ 參見林文凱，〈地方治理與土地訴訟：清代臺灣竹塹地區金山面墾隘土地控案的社會史分析〉，《新史學》（臺北）18:4（2007年12月），頁125-187；林文凱，〈清代地方訴訟空間之內與外：臺灣淡新地區漢墾莊抗租控案的分析〉，《臺灣史研究》14:1（2007年12月），頁1-70；林文凱，〈「業憑契管」？：清代臺灣土地業主權與訴訟文化的分析〉，《臺灣史研究》18:2（2011年6月），頁1-52；林文凱，〈清代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論檢討：「地方法律社會史」研究提出的對話〉，收於柳立言編，《史料與法史學》（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頁311-348。

⁵¹ 林文凱，〈再論晚清臺灣開港後的米穀輸出問題〉，《新史學》22:2（2011年6月），頁215-252。

謝美娥等學者，都誤信清代臺灣臺運等官方文書史料的說詞，主張十九世紀初期以來臺灣因人口漸增、可供開墾地漸少，以致臺地餘米漸減，所以出口日益減少，林滿紅之所以誤信清代海關統計，認為開港後臺米不是重要出口品，也與此說法的存在有關。但我從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注意到這個說法有問題，由於清代臺灣並非封閉的經濟體，開港前臺灣的經濟運作，主要透過米糖的輸出來換取對岸的手工業商品，方能維持社會經濟的正常運作，若此說為真，由於臺灣十九世紀以來人口仍持續增加，且作為另一主要商品的臺糖在開港前並無增加出口，而主要出口商品臺米輸出大減，臺灣自十九世紀初期以來必然會經歷嚴重的經濟蕭條，但衡諸清代臺灣史料與相關研究發現這顯然不是事實。因此，我透過清代臺運制度運作的檢討，說明官方說詞造假的緣由，並透過清代開墾歷程與人口及米穀產量的重新估計，推估開港之前的臺米輸出問題。⁵²

最後，是我的晚清到日治初期臺灣近代化討論。如同張隆志的臺灣史學史分析，1980年代以來，針對臺灣近代化的奠基者是晚清的劉銘傳還是日治初期的後藤新平，留日臺灣史學者戴國輝與民間學者楊碧川之間，有一個涉及民族主義與歷史認同的論戰。另一方面，許雪姬在有關晚清臺灣史研究方法論的論文中，也指出必須透過晚清劉銘傳與日治後藤新平作為的比較，來釐清晚清歷史變遷的意義。在這些啟發下，我展開晚清到日治初期劉銘傳與後藤新平改革的比較研究，主要採用歷史社會學比較制度論的取徑，將分析重點擺在如何界定近代化的制度性內涵，並參照韋伯與傅柯的社會學理論，提出傳統到近代統治理性轉型的分析觀點，來比較劉銘傳與後藤新平這兩個相距不久的政經改革的歷史意義。

劉銘傳的各項改革（清賦、行政、財政、開山撫番）作為清代洋務運動的一部分，雖然不乏近代化的目標，但其制度性運作局限於傳統的家產官僚制與傳統統治理性，沒有真正改變清代以來臺灣的國家與地域社會運作關係；與此相對，後藤新平諸多的政經改革作為明治維新在殖民地的移植，則依賴於近代科層官僚制與近代統治理性來推進，就此改造了臺灣的國家與地域社會的制度性運作方式。因此，從我的歷史制度論分析來說，晚清劉銘傳的改革儘管對臺灣社會發展

⁵² 林文凱，〈再論清代臺灣開港以前的米穀輸出問題〉，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頁99-133。

有重要意義，同時對後藤新平的改革也有路徑依賴的意義，但以我的近代化概念來說，臺灣近代化的起點是後藤新平等殖民官僚所開展的殖民近代化（性）。

另外，我的比較研究也扣連到我晚近在進行臺灣史研究時，所強調的歷史社會學觀點，即臺灣史與東亞史（中國史、日本史）及世界史的相互關聯與交互比較。晚近的臺灣史研究，也許因欲去除長期以來受到中國民族主義不當干預的影響，而有只就臺灣討論臺灣的傾向，但我基本上延伸曹永和老師臺灣島史的觀點，主張臺灣的歷史一方面是臺灣本地空間下不同人群共構的整體歷史，但同時也必須擺在臺灣與東亞及更大的世界變動的脈絡下來考察。因此，我的臺灣近代化論比較史研究，試著強調晚清到日治臺灣的歷史變遷，其實是世界與東亞（中國、日本）及臺灣三重歷史變動的輻輳展現——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的東亞衝擊、晚清中國洋務改革在臺灣的延伸、日本明治維新在臺灣的移植。因此臺灣史不僅是臺灣史，也是東亞史與世界史的體現，而此種視角亦可擴展臺灣史研究在東亞史與世界史研究的學術意義。⁵³

第三部分，我反過來以歷史學研究經驗，來對臺灣社會學界，尤其是歷史社會學研究發聲。臺灣社會學的教學與研究有一個明顯的困境，就是在教學上普遍以西方三四百年的現代性變遷理論為參照，來思考討論臺灣的社會變遷，但在整個社會學研究的社群上卻顯現了歷史社會學研究過少，或者即使從事歷史社會學研究，卻大多無法跨越史料與語言的障礙，僅有少數學者從事清代與日治時代的臺灣社會研究，使得臺灣社會學的研究幾乎都集中在戰後臺灣社會或者民主化前後的臺灣社會變遷研究。這種社會學研究的歷史化或本土化不足，對於臺灣社會學研究的開展造成一些侷限，也使得臺灣社會學與歷史學的相互交流與刺激無法更好的開展。

⁵³ 林文凱，〈晚清臺灣開山撫番事業新探：兼論十九世紀臺灣史的延續與轉型〉，《漢學研究》（臺北）32：2（2014年6月），頁139-174；林文凱，〈臺灣近代統治理性的形構：晚清劉銘傳與日治初期後藤新平土地改革的比較〉，《臺灣史研究》24：4（2017年12月），頁35-76；林文凱，〈晚清臺灣的財政：劉銘傳財政改革的歷史制度分析〉，《臺大歷史學報》（臺北）61（2018年6月），頁341-392；林文凱，〈臺灣「中央財政」體制的轉型：日治初期（1898-1905）後藤新平總督府財政改革之歷史意義〉，《中央大學人文學報》（桃園）63（2017年4月），頁1-44；林文凱，〈清代到日治時代臺灣統治理性的演變：以生命刑為中心的地方法律社會史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90：2（2019年6月），頁317-365。

我簡單從幾個面向，說明臺灣史研究對於社會學的現代性變遷討論可以提供的刺激。首先，是跳脫歐洲中心論的現代性分期的反思，重新把清帝國的歷史放在十六至十八世紀近代早期的東西方歷史比較中來分析。到目前為止，臺灣社會學界，尤其不是從事歷史社會學研究的學者，對於東西方社會歷史比較的思考，仍然停留在西方社會學者馬克思與韋伯（或如歷史學者黃仁宇）等人的十六世紀東西方分流的觀點，多習慣以封建停滯的觀點來看待清代的政經文化。但晚近比較史的研究如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論、濮德培（Peter C. Perdue）的新清史論，或岸本美緒的東亞近世論，都強調東西方的真正分流是在 19 世紀西方工業革命後，對東亞展開第二波帝國主義衝擊之時，而東西方在 16 到 18 世紀的歷史發展，一方面是東西方第一波全球化的共同產物，另一方面在這個近代早期時期，東西方的政經文化發展其實具備許多類似性，而有許多值得比較之處。我的清代臺灣史研究，嘗試以清代臺灣為歷史個案參與這些東西方近代早期比較史的學術論辯，並與前述彭慕蘭、濮德培等清代中國史觀點進行批判性對話。⁵⁴

其次，應該以臺灣史、東亞史（中國史、日本史）、世界史的視角，並以殖民現代性、東亞學知交流等概念，來思考東亞各國與臺灣的現代性變遷。臺灣社會學者必須注意到東亞的現代性是在西方帝國主義的衝擊下展開的，而東亞如臺灣、韓國與中國的現代性，則不僅是西方帝國主義衝擊下的產物，也同時是後續日本帝國主義衝擊下的結果。且如日治時代的臺灣、朝鮮與滿洲國等地區的近代性發展，甚至晚清以來中國的光緒新政，都是在日本帝國的殖民近代性的影響下展開，而在推展過程中，日本帝國從西方所繼受的各種近代化學知，如何透過東亞學知交流的過程移植或影響了東亞各地的近代化進程，也值得探究。應附帶一提的是，東亞十九世紀晚期的歷史變遷，是在十六至十八世紀發展的近代早期新傳統社會的基礎上經歷改造的，因此前述對於近代早期東亞社會的正確認識，也

⁵⁴ 林文凱，〈清代臺灣與近代早期英格蘭的土地制度與經濟發展：一個統治理性的比較制度分析〉，《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臺北）55:1（2017年3月），頁65-128；林文凱，〈第六章 清帝國在臺灣的早期現代統治理性：對東、西方現代性演變的再思考〉，收於湯志傑主編，《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從臺灣出發的反省》（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頁269-324；林文凱，〈從世界史比較視角重新認識「清代中國史」：評 Peter C. Perdue 著，《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2021年7月30日），公共史學網站「歷史學柑仔店」，下載日期：2023年7月31日，網址：<https://reurl.cc/q0R86E>。

是認識東亞社會近代化必要的歷史基礎。⁵⁵

晚近臺灣社會學界有些歷史社會學者，開始關注臺灣長時期現代性演變的議題（如黃金麟等編《帝國邊緣：臺灣現代性的考察》、湯志傑編《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從臺灣出發的反省》），⁵⁶ 或是重新介紹臺灣社會學研究先行者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臺灣社會史研究（鄭力軒著《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臺灣研究》）。⁵⁷ 正如這些臺灣社會學者的跨領域研究所提示的，我認為更進一步推動臺灣社會學界的歷史社會學研究，並借鑑新的長時段的臺灣史研究，或許是解決臺灣社會學研究歷史化或本土化不足，並促成臺灣社會學與歷史學交互刺激、共同演化前進的重要路徑。

（三）曾文亮，〈跨界、多元的臺灣法律史研究：我學、我見、我思〉

1. 我與臺史所的緣分

（1）從法律系到法律史研究

1993年，臺史所籌備處成立。同年，受惠於當時臺灣史研究成果累積而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的王泰升回到臺大任教，開啟臺灣法律史研究的序幕。我則在隔年選修了王泰升開授的臺灣法律史專題，在王老師帶領下前往臺大研究生圖書館閱覽「淡新檔案」原件，並選定其中一款進行研究，也因此決定攻讀研究所基礎法學組。同年，我第一次來到中研院，在傅斯年圖書館、臺史所黃樓、郭廷以圖書館等處學習調查、研究公私藏古文書、土地文書／契字以及總督府公文類纂目錄等資料，甚至「不辭百里」地前往南投「臺灣省文獻會」（現「國史館臺灣文獻

⁵⁵ 林文凱，〈日本治臺經驗取鑑：戰前福建官方的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之分析（1911-193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101（2018年9月），頁117-155；林文凱，〈貌合神離之兩岸關係：戰爭前夕福建與臺灣的經建與農業調查之交流（1934-1937）〉，《臺灣史研究》25: 4（2018年12月），頁119-162；林文凱，〈晚清奉天省土地改革與日本關東州土地調查：統治理性與調查學知之比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14（2021年12月），頁41-82；林文凱，〈從臺灣到滿洲：以關東都督府警政建設為中心的日本帝國統治學知移轉分析（1905-1918）〉，《臺灣史研究》30: 1（2023年3月），頁45-86；林文凱，〈東亞近代學知交會與認同流動專號導言〉，《新史學》33: 1（2022年3月），頁1-12。

⁵⁶ 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主編，《帝國邊緣：臺灣現代性的考察》（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0）；湯志傑編《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從臺灣出發的反省》。

⁵⁷ 鄭力軒，《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臺灣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2）。

館」) 閱覽總督府公文類纂原件。1997 年台灣法律史學會成立，我們這些學生也有幸成為創會會員。

進入 2000 年代的臺灣，隨著政黨輪替，一切充滿新的氣象。在臺灣史的研究上，一方面，新的學術機構不斷成立，2004 年中研院臺史所正式成立，更標誌著臺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里程碑；另一方面，隨著各種重要史料的數位化與資料庫建置，也大幅提升了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利用臺灣史歷史資料的便利性，有助於跨領域研究的發展，我就是其中一位受惠者。

我在 2001 年進入博士班，以日治時期臺灣人家族法舊慣的變遷為題，撰寫博士論文。主要的參考資料，除了總督府所制定的各種法令與總督府法院的判決資料外，更多的是總督府的政策，以及總督府與日本帝國中央的互動，因此，對於日治時期臺灣歷史資料的需求更為提高。臺灣史資料的數位化，大幅降低了我利用這些資料的門檻，也減少了舟車勞頓之苦。

博士班期間，我也有幸參與王泰升老師的日治法院檔案計畫，協助將臺北、臺中、新竹、嘉義、高雄、花蓮等地方法院日治時期的判決、行政文書資料翻拍整理，而後又與臺大圖書館合作，完成「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嘉惠學界。

(2) 從臺灣法律史研究到中研院臺史所

原本在法學院中的我，因為對臺灣法律史研究的興趣，而接觸臺灣史研究，2008 年臺大畢業後，隨即承蒙中研院臺史所的厚愛，進所從事博士後研究，兩年後又順利成為助研究員，正式開啟我在臺史所的研究，也讓我從多年來的訪客身分，變成了自己人。就在我因為成為自己人而感到開心的時候，卻因為同仁表示看不懂我寫的東西，而同時深刻感受到不同學門之間的隔閡。因此，在我之後的論文寫作過程中，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就是要寫出讓臺灣史研究者也能讀懂的法律史研究。以下，簡單說明我在臺史所這十餘年來的研究方向與研究成果。

第一個方向，是臺灣人家族法與家族史研究的深化。包括利用法院判決資料分析日治時期家族法制舊慣的內涵變遷，或是結合判決與臺灣人日記資料，探討女性在家產法上地位的具體內涵，或是家族法的學說討論與殖民地法律政策的關係。⁵⁸

⁵⁸ 參見曾文亮，〈全新的「舊慣」：總督府法院對臺灣人家族習慣的改造（1898-1943）〉，《臺灣史研究》

第二個主題，是有關法律人社群的研究。日治時期以來隨著行政權與司法權的分立，圍繞在司法權的運作而出現了相關的專門職業，即法官、檢察官與律師。律師的部分，以臺史所收藏的〈黃繼圖日記〉為主要史料撰寫了戰火下的辯護士（未刊稿），而後則以總督府官報中的辯護士登錄資料、各辯護士的人物誌資料以及報紙的報導為基礎，討論日治時期臺灣辯護士制度的發展。判官、檢察官部分，則進行過整體的判檢人事制度與個別法院長的研究。⁵⁹

第三個研究方向，是從國家本身以及國家跟人民關係切入進行的研究。例如從日治初期土地關係的接收、整理，討論日本殖民統治下所帶來的土地業主權跟地方行政的意義，或戰後二二八事件中的懲罰問題，討論背後所代表的國家權力性質。⁶⁰

2. 從臺灣史研究看到臺灣法律史研究的發展

時光荏苒，從學生時期接觸、學習臺灣法律史，到在臺史所進行臺灣法律史研究，不覺倏忽 30 年。期間不僅參與、見證了臺灣法律史的撥雲見日，更從臺史所汲取養分，親身經歷了臺灣史研究開枝散葉的過程。因此第三部分，我想從臺灣史研究的角度，來回顧臺灣法律史的歷史過程。

17: 1 (2010 年 3 月)，頁 125-174；曾文亮，〈日治時期臺灣土地調查事業中的「家產」問題及其解決〉，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頁 349-384；曾文亮，〈日本統治期における台湾人家族法と殖民地統合問題〉，收於松田利彦編，〈植民地帝国日本における知と権力〉（京都：株式会社思文閣出版，2019），頁 235-260；曾文亮，〈日治時期臺灣人家族舊慣改革與女性法律地位〉，收於陳延媛主編、林政佑校訂，〈從臺灣與朝鮮反思日本的殖民統治〉（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1），頁 71-113。

⁵⁹ 參見曾文亮，〈戰火下的辯護士：「黃繼圖日記」中的臺灣人法律社群經驗〉，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主辦，「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臺中：國立中興大學綜合教學大樓 13 樓國際會議廳，2010 年 8 月 19-20 日）；曾文亮，〈殖民地臺灣的辯護士社群與法律職業主義〉，收於李承機、李育霖主編，〈「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 91-133；曾文亮，〈鈴木宗言與總督府司法制度改革〉，收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輯，〈第 11 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21），頁 367-393。

⁶⁰ 參見曾文亮，〈臺灣日治初期土地關係的接收、整理及其影響，1895-1905〉，《成大歷史學報》（臺南）49（2015 年 12 月），頁 257-313；曾文亮，〈二二八事件中的叛亂與懲罰：兼論戰後初期國民政府的政治、軍事與法律關係〉，《臺灣史研究》22: 4（2015 年 12 月），頁 83-122。

(1) 臺灣法律史研究早已有之

A. 日治時期已有臺灣法律史研究

臺灣法律史的研究可說在日本統治時期已經存在。例如 1900 年代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以京都帝大民法學教授岡松參太郎為實際負責人，對殖民地臺灣的民商習慣之詮釋，即屬臺灣法律史之研究。但是這些研究是基於殖民統治目的需求，因此儘管採取了歐陸法學體例與方法，但本質上乃是以日本帝國為中心所展開的殖民地法律史研究。⁶¹ 從日治後期殖民地統治方針轉向「同化政策」後，舊慣調查會旋即遭到解散，以及日本民商法制除了民法、親屬繼承兩編外，均適用於臺灣，也可看出臺灣的非主體性。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日治後期臺灣的法律史研究課題逐漸限縮到親屬繼承習慣與祭祀公業制度，而法律實務家也取代了大物法學家成為此一時期的主要研究者，直到後期才隨著臺北帝大的成立，而有所改變。⁶²

令人欣慰的是，在日治時期的法學討論中，臺灣人觀點的政策主張或研究並未缺席。在 1920 年前後的法律政策討論中，時在日本東京留學的臺灣人知識分子，根據德國歷史法學派的理論，提出臺灣人親屬繼承法應依照臺灣人習慣的主張，而到 1930 年代後，更出現從日耳曼團體法觀點的臺灣家族與社會團體研究。⁶³ 這些臺灣人觀點的研究，雖未能擺脫日本帝國框架，但已經逐漸具備發展成臺灣民族法學研究的潛力，可惜隨著 1930 年代後期戰爭的爆發與日本軍國主義發展，已無此類民族法學發展的空間。

B. 戰後中國法制史對日治臺灣法學的收編

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後，隨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負責接收臺灣，廢止日本法令，並解除各級日本官員職務，陸續遣返回日本內地。日治時期主導臺灣法學研究的日本法律家／法學者也悉數遭到遣返。取而代之的是民國法制的實施，與臺灣被視為中華民國的特殊省分。臺灣法制與法律史的研究，乃從日本帝國為中心，

⁶¹ 有關岡松參太郎在舊慣調查會的業績，可參見王泰升，〈學說與政策交織下的日治臺灣民事法制變遷：以岡松文書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臺北）37:3（2008 年 9 月），頁 47-95。

⁶² 詳細的討論，可參考吳豪人，〈殖民地的法學者：「現代」樂園的漫遊者群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⁶³ 參見曾文亮，〈日本統治期における台湾人家族法と殖民地統合問題〉，頁 235-261。

轉向中華民國為中心。本島人法律家則只有極少數能夠在民國法學尚未到來之前成功躋身臺灣大學教職，而成為學院派法學者，如蔡章麟、洪遜欣、戴炎輝等。

三位法學者中，可歸類為法律史研究者只有戴炎輝一人。進入臺大任教的戴炎輝，從戰前法律實務家的業餘研究者身分，一躍而成為臺灣最高學術機構的專業學者，研究環境與條件的差異，不可同日而語。但與此同時，在研究方向上也出現明顯的轉變。在戰後 10 年間出版的主要作品，〈日治 50 年臺灣法制〉可謂日治時期法制的總結與終結，《中國身分法史》、《中國法制史》則是其轉向中國法制史研究後的重要成果。⁶⁴ 也就是說，雖然躋身大學教授，但不得不放棄過去的研究路線。

隨著戰前臺灣法制史研究者或遭遣返、或遭收編後，中國法制史則成為戰後臺灣的法律史研究正統，甚至在 1970 年後成為國家司法官考試的必考科目，直到 1980 年代才廢止。戰後新出現關於臺灣的法律史研究，或被歸入傳統中國法、中國法制史，或被歸為殖民地法制研究。臺灣法制史的研究，幾乎徹底消失在研究者的視域中。⁶⁵

（2）具有臺灣主體性的臺灣法律史研究之建立與開展

A. 具有臺灣主體性的臺灣法律史研究

1990 年代初期，在政治上的解嚴與終止動員戡亂之後，臺灣的主體性終於得到發展的空間。具有臺灣主體性的臺灣法律史研究，則經由以下三個事件而逐漸誕生：1. 臺灣法律史研究的倡議：1993 年，首位專攻臺灣法律史學者王泰升回臺大任教，開始倡議臺灣法律史研究。2. 臺灣法律史研究概念的擴散：1995 年，臺灣法學會舉辦「臺灣法制一百年」的研討會，並於會後出版《臺灣法制一百年論文集》，這是臺灣法學界第一次從臺灣主體角度思考臺灣的法制課題。3. 台灣法律史學會的成立：1997 年，以黃宗樂、王泰升等學者為首的臺灣法律史研究同好，共

⁶⁴ 有關戴炎輝在戰後的發展與評價，可參見曾文亮，〈戰後臺灣對日治時期法制的詮釋與評價（1945-1970）〉，收於李承機、李育霖主編，《帝國在臺灣 II：「日本時代」的歷史記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頁 71-104（特別是頁 81-84）。

⁶⁵ 王泰升將戰後（1945-1995）有關臺灣法制史的研究，歸類為：依附於「傳統中國法」之研究、依附於「中華民國法制」之研究與依附於「殖民地法制之研究」。參見王泰升，《台灣法律史的建立》（臺北：王泰升，1997），頁 57-98。

同發起組織「台灣法律史學會」。同年王泰升出版了《台灣法律史的建立》專書，分從研究方法、日治時期法律與專題研究三方面，示範了臺灣法律史的研究。⁶⁶

以王泰升的《台灣法律史的建立》為代表，可以看出當時臺灣法律史研究的幾項特色：

a. 強調臺灣的主體性：1980年代後，隨著臺灣本土意識的發展，從臺灣社會角度思考臺灣的研究，逐漸為學界所接受。因此臺灣法律史研究即強調從臺灣社會角度出發所進行的法律史研究，已跟當時在臺灣居於主流的中國法制史相區別。

b. 強調法律與社會的方法：除了受到美國法律史研究中法律與社會取徑的影響外，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中國法制史研究強調典章制度，或如戴炎輝中國法制史係以歐陸法釋義學方法「從今釋古」，著重法條解釋，而忽略法律的社會實踐。因而一方面強調法律與社會的關係，另一方面為了跟當時法制史=典章釋義的理解相區別，而稱為法律史。

c. 法學與歷史學的跨領域研究：因為強調臺灣社會而不僅只是臺灣的法律，所以在法學之外，需要借助臺灣史研究的能量，以認識歷史上的臺灣社會，因而得以探討臺灣歷史上的法律與社會關係。

d. 多源而多元的臺灣法律史：從臺灣歷史發展檢視法與社會荷西歐陸法，清帝國法，日本近代法，中華民國法，自由民主化，從現今臺灣社會來看，實存在著多個歷史來源，因而臺灣法律史的歷史淵源而言，是多源的。又這些不同來源的法律，都曾經在臺灣歷史上的某個時期影響臺灣社會，成為臺灣社會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對臺灣社會而言，其法律文化也是多元的。

B. 臺灣法律史研究的開展

1997年台灣法律史學會成立後，到今年已經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期間除了由王泰升引進的法律與社會研究取徑外，也陸續有不同觀點或方法，乃至日治時期以外的臺灣法律史研究成果出現。2017年以台灣法律史學會成立二十週年為契機，舉辦了「法律與歷史的匯合：『臺灣法律史二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各項場次的主題，並不依照法律體系區分，而是更具有結合法律與社會／歷史的

⁶⁶ 參見王泰升，《台灣法律史的建立》，頁57-98。

特色，⁶⁷ 也顯示出二十一世紀的臺灣法律史研究，正朝向更多元而跨學科的發展。

從法律史研究者的學術養成背景，同樣可以看到這樣的發展趨勢。例如同樣留學美國的臺灣法律史學者，從一開始的法律與社會，到後來的法律多元、法律文化、女性主義乃至法律全球化觀點；加上留學日本所帶回來的日本法制史傳統、留學歐陸所帶回來的歐陸法律史傳統，均使得臺灣法律史的研究方法與理論觀點更為豐富多元。例如法律全球化觀點的法律史研究，從歐美的角度看到的是法律擴張的全球化，但從臺灣或東亞社會，則是法律移植或移植的問題。女性主義法學強調透過法律史研究解構傳統父權法律體系，並以此前提展開對現行法的批判與修改主張。法律多元或法律文化論關注到被國家法忽略的原住民法文化或法制度，能夠讓消失在國家實定法或民族統一法典中的少數族群法律傳統被看到。

另一方面，隨著臺灣史研究的發展，臺灣法律史研究也同樣必須面對臺灣的重層複雜歷史經驗。例如，源自近代歐陸法的「法律」概念，應如何運用於近代之前的臺灣法律史研究？又如在多重政權更迭與人流移動的臺灣，不僅法律的連續性受到影響，社會或人民法文化的斷裂與連續性，也格外複雜。由此以觀，即使在方法與理論觀點上不斷增加，臺灣史研究對臺灣法律史研究而言，仍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3. 結語

戰後的臺灣法律史研究，如果以王泰升進入臺大的 1993 年開始起算，到今年也正好三十週年。其成果雖然未如臺灣史研究成果般開枝散葉，但在研究議題的涵蓋面也算逐漸擴大。不過從臺灣歷史的發展階段來看，則多集中於日治以後，清治以前之歷史涵蓋面仍然不足，但這也意謂臺灣法律史的發展空間相對較大。因此不僅是法學院的學生，歷史系或臺灣史出身的研究生，也能在歷史研究基礎上，探究臺灣的法律史。

⁶⁷ 12 項主題分別是：1. 作為新學科的臺灣法律史、2. 臺灣社會的財產、3. 家庭與法律、4. 國家權力與司法專業、5. 刑事司法與原住民法律、6. 法律如何形塑勞動生活、7. 智慧財產權的演進史、8. 論臺灣與中國的法律與經濟發展、9. 調解制度的變遷：日治臺灣與近代日本、10. 習慣與法律：臺灣、日本與西方經驗的交織、11. 戰後臺灣社會運動與法律改革、12. 戰後臺灣與日本的身分法發展、檔案中的傳統中國法。

五、第四場次：歷史視野與史料解讀



圖七 第四場次

說明：左起為林玉茹、陳宗仁、莊勝全（主持人）、陳延媛、陳培豐。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提供。

（一）陳培豐，〈庶民的世界與聲音／歌唱：為庶民「述史」〉

1. 建構「庶民史」的方法——聲音／歌唱

歷史研究的是「過去」。過去已消逝無蹤，因此歷史研究需要「史料」來做為論述基礎。所謂的史料，說穿了便是文字記載。換言之，是一些識字階級，如統治者、知識分子、士紳等所記載有關過往情事的文獻。

在農業封建時代的那一個「過去」裡，教育並不普及、識字者也都不多；加上由於歷經連續殖民統治之故，臺灣知識階級的「公用語文」經常變異而流動。因此在多元族群社會下，雖然臺灣人一再追求「言文一致」，但在苦無良好成果的歷史語境下，無論統治者是誰，也不管知識分子或社會底層，臺灣民眾均陷入一種難以透過自己熟悉母語的書寫方式，來表達內心思維或遭遇的文化困境。

即使如此，臺灣的人文科學研究長期以來均習慣透過前人留下文字紀錄來觀察歷史；為此，其研究對象經常聚焦在統治者、知識分子或地方士紳的言行活動

或事件政策上。相對於此，做為社會主要構成分子、且占了人口絕大多數的庶民，則往往被忽視或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在我們的歷史研究上，勞農階級經常被認為缺乏政治文化活動能動性。有關庶民研究或社會文化史，一直冷門，累積數量也稀少，鮮少有人願意去嘗試這方面研究。

其實，做為草根底層的勞農庶民一直和土地連結親密，他們擁有最豐富的在地生活經驗智慧和文化思維。但因為不識字無法書寫，這些人難以替自己在「過去」的場景留下紀錄，而喪失歷史話語權；所以在歷史上，他們只能成為被同時期知識精英描述的對象。而在奉近代化為圭臬的「過去」，他們往往被賦予無知、愚鈍、純樸、善良的印象，在歷史上成了扮演點綴角色的一群。我們的歷史舞臺上，這些曾為臺灣經濟發展立下莫大貢獻的勞農庶民，面貌始終模糊，甚至讓人忘記了他們其實才是奠定本土文化基礎的原動力。

勞農庶民真的就沒有可做為研究基礎的「史料」？這些人的集體處境和情緒真的就無從理解，不能是一個學術研究議題？答案當然不是。因為不識字或教育程度低的勞農庶民，雖然不會「我手寫我口」，但他們卻能「我口唱（說）我心」。雖然曾受到日本高壓統治，又遭遇國民黨威權體制的箝制；且臺語本身又缺乏一個成熟的近代化表記系統，但長期以來這些社會底層，卻一直不停地以他們的舌尖或耳朵在傳達、記錄、確認他們的集體遭遇、思維、情緒以及喜怒哀樂。聲音／歌唱一直都是他們傳達或記錄自己生活樣態的手段工具。靠著這些聲音信息，勞農庶民的「過去」是可以被理解、發現、觀察的。

2. 民眾用聲音留下的信息：「低俗」的流行歌曲

聲音／歌唱是底層庶民所擁有最自然的娛樂或文化。只不過這些以流行歌曲為主的聲音話語，往往不在於高談闊論，而被隱藏在知識分子嗤之以鼻的批判浪潮之中。但就如沒有畫上濃妝的村姑，才能彰顯出勞農社會真實的樣貌般；沒有過多修飾的歌詞，反而突顯出庶民生活的真實性；而不符合西洋音樂審美標準的歌唱方式，恰好顯露出人民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自然表情。臺語流行歌曲的「低俗」是其生命力所在，也是庶民在這塊土地上所刻下的痕跡。這些聲音／歌唱也正是我們理解草根底層之生涯百態和情感結構的有效管道。

庶民音樂或大眾文化不可能以「純種」之姿存活下來，它必須隨著時代潮流

的演變，接受各種要素的混融與妥協，而以多元鑲嵌的姿態，不斷改變自己的形態，甚至製造出更多的附加價值，方能夠吸納更多消費者而存活下去。⁶⁸ 換言之，流行音樂一直不斷地經歷在地化和全球化之間的磨合折衷。而庶民一方面彰顯出其對於自身傳統的依賴執著，又反映出其對新時代變化的敏感和渴望。

因此，每一個時代的聲音／歌唱最後投射出的便是「世相」——社會樣態。也因為這樣，每當我們在探究「聲音的歷史」時，其實也意味著我們聆聽到「歷史的聲音」。聲音／歌唱的相關研究，同時穿梭在「世界／在地，過去／現在」這兩個觀點和範疇之間。關注到這兩個面向，一個具體的歷史思考框架往往便自然浮出。

其實有關流行歌曲研究，在臺灣已行之多年。只不過初期因為受到難以聽到歷史現場原聲之限制，這些研究只能從有形的歌詞切入，而很少觸及聲音。換言之，剛開始的臺語流行歌曲研究，通常都只是把歌詞當做文本來進行詮釋分析，繼而告訴我們什麼是「世相」。但近年來由於一些老舊曲盤大量被發現，而蒐藏家們也樂意公開和大眾分享；因此昔日無法聽到的部分原音，在 YouTube 或特定網站上都可以聽到。由於研究環境的改善，臺語流行歌曲研究，也解開了之前的束縛而有了改變。

以我自己為例，我原本也是僅以歌詞來進行聲音／歌唱的研究。但幾年前當我聽到日治時期，最具代表性歌手純純本人的歌聲後我頗為驚訝。因為在這之前我一直認為，戰後紀露霞、陳芬蘭甚至江蕙的唱法和純純一脈相承。那種使用轉／顫音做為花腔裝飾的演歌唱腔，在戰前便存在於臺灣，是我們傳統唱歌的方式。不僅如此，我還把這個「誤認」的假設當做前提，去設定問題框架。然而實際聽了日治時期的原音後，我才理解我那「想當然爾」的前提並不存在。因為日治時期臺灣人是以自己傳統「哭調仔」式的唱法——也就是聲線筆直或顆粒，經常以在尾音加上微妙收降的唱法，去詮釋自己的情感。

發現對昔日臺語歌曲的聲音／歌唱有誤解後，我立刻重新思考設定問題意識。具體的說，我發現不應該只關心臺灣的庶民在「唱了什麼（歌詞、旋律）」？

⁶⁸ 朱介英，《偶像行銷：理論與實務兼具的流行音樂行銷課綱》（臺北：雨彤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 55。

而是要去問，這些人在不同的時代到底是「用什麼方式（表情）在唱歌」？而唱歌方式「為什麼要改成這樣」？我開始體會到音樂歌曲的載體畢竟還是聲音／唱腔，與其去問這些相對精英的流行歌曲詞曲作者，為什麼要創作這樣的作品？倒不如去關心更為底層的這些歌手，為什麼要這樣唱？而這樣唱之後，為什麼會受庶民受眾的歡迎而相繼被模仿，終至成為臺灣人的唱歌習慣或美學標準。

於是，除了旋律、歌詞之外，我開始把唱腔的變化當做問題軸心，開始去解析臺灣社會的草根底層，為什麼要在戰後改變唱歌方式。這些人以及國民黨政府在戰後工業化、都市化甚至八七水災等這些重大社會變遷發生時，如何去因應面對大規模的離鄉？

換言之，1960 年前後臺灣在首次面臨人口大移動時，以本省人為主的勞農階層曾萌生過什麼樣的集體情緒。在被執政者漠視的困境下，這些心存怨念，又因貧困離鄉、心懷無奈悲哀又懷想家國的庶民，是如何在威權體制下以「我口唱我心」的方式去定義、描述自己。而我的結論是，臺語歌曲的演唱唱腔其實不存在於戰前，而是戰後一群人生挫敗組，不斷在追問或確認自己是誰？以及應該要如何生活下去等課題時，所反覆演繹出來的結果。⁶⁹

3. 聲音做為一個學術領域

然而除了唱腔之外，還有什麼可讓我們做為臺語流行歌曲研究取徑呢？有的。除了唱腔之外，例如速度、節奏，都可以是我們探討臺語歌曲的切入點。

1960 年代當臺語歌曲由臺灣傳統歌仔跨越到日本演歌之際，其實也正好是搖滾樂風潮衝擊全球的時期。包括日本、韓國甚至臺灣的華語流行歌曲，都乘著這波全球性風潮而開始轉型。然而熟知臺語歌曲的人都知道，臺語的搖滾樂是要等到 1990 年代「新臺語歌曲運動」後，才逐漸在本地流行歌曲土壤中生根發芽。1960 年代臺語歌曲雖然也出現「阿哥哥（搖滾）風潮」，但這波新節奏潮流並沒有撼動臺語歌曲，讓其產生明顯的質變。

具體的說，1970 年代臺語歌曲在唱腔上，還是維持其強調黏膩轉音／顫音的風格；在歌詞中依然以社會邊緣人——七逃（迺迺）人、歹命人、艱苦人、行船

⁶⁹ 陳培豐，《歌唱臺灣：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變遷》（新北：衛城出版，2020）。

人、舞女、酒女、孤女等為主題，訴說這些人的哀苦、無奈、忍耐、怨念。這些速度緩慢、節奏不明顯的歌曲，其實和律動感強烈、節奏清楚並含攝著叛逆、自由主義、反戰、性解放、都市摩登等社會意涵的搖滾樂南轅北轍。在內容上這些受盡委屈、陰柔悲涼、速度較慢的「傳統」臺語演歌，和被衛道人士視為「洪水猛獸」具進步開放、有陽剛特徵的新時代節奏，剛好成為強烈對比。

然而如前所述，世界上沒有「純種」的流行歌曲，在流行歌曲這個大眾娛樂中，純種不變意味著衰退滅亡。可是有趣的是，臺語流行歌曲並沒有因為和搖滾新節奏呈絕緣狀態而走向滅亡。在臺語歌曲衰退時期，勞農階級之間正風行著臺灣獨特的電子琴演奏音樂。⁷⁰ 這些音樂演奏雖然缺乏搖滾新節奏，但卻充斥著恰恰、探戈、倫巴、曼波等中南美的節奏。這個現象告訴我們，臺語歌曲的發展具有明確的在地脈絡，其和世界潮流並不同步。以旋律來看，戰後臺語歌曲充滿沒有明顯節奏感的日本演歌味；在節奏上則和英國、美國較沒有關連。它停滯在 1960 年代初期這個時間點，在約近二十年後才逐漸踏上全球化的腳步。在這近二十年當中，和臺語歌曲為伍的反倒是中南美的音樂節奏。

音樂原本便是旋律和節奏的結合。作為大眾娛樂，流行歌曲的節奏經常會引發跳舞風潮。因為，跳舞必須要有節奏明顯的歌曲，來作為節拍和舞步的應合。有速度節奏之歌曲的暢銷流行與否，正好可以來印證日治時期「跳舞時代」，是否是曾經存在於庶民世界（針對這個問題，我個人是存疑的）。

再者，大部分的臺語歌曲都是使用五聲音階，而非西洋七聲音階所創作而成。音階的意義不在數量多寡，其是因應一個民族歌唱時的唱腔或語言，或發聲的特徵習慣而萌生。音階凝集了人類對於聲音的哲思和對待聲音的方式態度，是一種構思、觀念、理念。換言之，音階和人類文化、歷史、環境緊密相關，其保留了一個民族基本的「人性」。

進一步來說，音階其實是語言的產物。⁷¹ 臺語歌曲的鄉土味，其實和臺語這個語言的本身（抑揚頓挫）有密切的關係。臺語在音韻上的複雜，也讓臺語歌曲在創作上一直都難以逃脫出五聲音階，以及必須「依字行腔」否則會倒字的魔咒。

⁷⁰ 陳培豐，〈雙重解殖與「臺灣味音樂」的形塑（I）：臺語流行音樂之路（劉清池篇）〉，《臺灣文學研究彙刊》（臺北）27（2022年2月），頁107-145。

⁷¹ 有關這方面請參考小泉文夫，《歌謡曲の構造》（東京：冬樹社，1984），頁8-11。

而眾所皆知，音樂和「詩歌」息息相關難以切割。流行歌曲的形成和近代文學，尤其是近代詩運動有著連動關係。健全的近代詩詮釋共同體，才能讓以這個語文所創之詩詞，能以輕漫簡短的音韻節奏，有效傳達精深雅緻的意境。臺語歌曲「直白」、「低俗」的特徵，某一個程度反映了臺語近代詩的成熟度。而前述臺語歌曲在音階和歌詞上的特性之相關研究，其可牽連到臺灣本土的語言和文學，當然是一個有趣且極為重要的研究議題。

如上所述，聲音／歌唱是一個庶民文化研究的絕佳途徑。但它可以成為一個學術領域嗎？我個人認為可行性很高。因為除了流行歌曲之外，戰前戰後的俗謠〈七字仔〉、諧謔笑科、廣播劇；戰後的廣播節目、講古、黨外時期造勢會場的政治演講、市集的叫賣、拍賣等，這些以聲音為主體的大眾娛樂或文化政治活動，均存留著相當數量的音檔資料，都可以成為我們研究的對象。

當然，聲音／歌唱的研究，必然會運用到跨領域手法。因為這種樣態的研究必須把繁雜瑣碎，且不同學科的材料整合為一體。而角度、資料的多元交錯，可能導致我們在進行研究時，必須使用到 YouTube 或網路上的聲音或文章；且也可能要進行田野訪問，並運用娛樂報章消息等非典型的史料。所以在進行聲音／歌唱相關研究之書寫時，也就是在進行整體思維主張之脈絡化作業時，相關資料的運用和安排連結，便顯得極為重要。因為社會文化史、庶民史往往具有濃厚的故事性，結構太過鬆散或敘述雜亂將會失去溫度；對於讀者來說，枯燥無味的論述往往會造成閱讀理解的障礙，而讓人感覺無趣。

總之，不管是做為探討對象、問題意識或研究方法，聲音／歌唱這個最具「臺灣性」的材料都極其重要。惟其牽涉到臺語這個本省族群的母語，所以其研究本身會有一些條件門檻。但也就是因為如此，這些議題對於熱愛臺語文的學者來說是一條學術活路，同時也是其應盡的責任義務。因為只有透過這些聲音／歌唱做為取徑，去拼湊鋪陳出臺灣的庶民生活史或社會文化史，做為本土學知體系領域龍頭的臺語文或臺灣史學系，才能更貼近土地和人民。

具體的說，惟有梳理或解析出臺灣文化的特殊性和其發展的在地脈絡，我們才能在更精確地認知自身容貌，同時，更進一步去強化臺灣做為一個文化主體或獨立國家，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正當性。

（二）陳延媛，〈翻轉歷史視野：臺灣史為何不可欠缺底層與邊緣的觀點〉

2000年代臺灣史在歷史學界中成為名副其實的顯學，為了掌握臺灣史研究的最新趨勢，並由此進一步展望未來，自2008年起每一、兩年舉行一次的「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揀選該年最豐碩的成果作為專題領域評析，除了整理最新成果外，也策勵未來的展望。去年（2022）年底新冠疫情好不容易走到尾聲，已滿第十屆的該活動，也首次離開臺北至臺南舉辦。

1. 臺灣史的三大新轉向

此次會議各別專題領域不謀而合地點出塑造新的史學格局的三大顯著轉向：⁷²

（1）從戰前向戰後轉向：日治時期和清代長期以來一直是臺灣史的焦點，但這兩年來，戰後史成為史學界的新寵。學者們轉向探討二戰後的時代，重新詮釋臺灣史。

（2）從首都中心向地方轉向：過去的臺灣史書寫著重於以臺北或臺南等幾個「中心」為基點，來描繪臺灣整體的歷史。相較之下，最近的趨勢明顯偏向「地方觀點」，學者更願意深入研究地方特色，專注於「地方史」的研究，逐漸贏得史家的喜愛。

（3）從政治制度向日常生活轉向：新一代史家更傾向於探索飲食、休閒等貼近生活經驗的主題，相較於傳統史學中的社會政治或法律制度議題，其研究領域更為多元，大幅擴充臺灣史的整體範疇。

可見無論是時間或空間範圍，甚至包括題材，當代臺灣史研究已經進入新的階段，不僅脫離了中心與支配者觀點，也不再藉由外來學術典範，寧願立足於臺灣社會各角落中人們的親身經驗，藉此摸索更接近於臺灣本土之多元經驗的歷史書寫策略。該會議最後一場以「當代大眾史學的轉向與多元發展」為題目的座談會，進一步宣布不僅是書寫理念及選題，書寫臺灣史的主體也不再是學院中的少數學者，而是社會不同角落中的「我們」。然而，考慮臺灣社會與學界一同為了

⁷² 許宏彬，〈醫療渴望地方、地方渴望照護：回顧並展望臺灣醫療史的地方性〉，《臺灣史研究》30: 3（2023年9月），頁179-225。

讓臺灣史「從鮮學成為顯學」而奮勉的三十年路程，上述最新研究趨勢，與其說是自然或偶然的結果，毋寧說凝聚臺灣多年來的執著與努力，終於修成正果。⁷³

臺灣長期在不同統治者間處於被殖民狀態，從歷史回顧，還原臺灣的主體性及整體性，是三十年來匯集史家一致力量背後的內涵。因此，為了從已有的歷史書寫中找回臺灣史的主體性及一貫脈絡，首先必須嘗試翻轉主流歷史詮釋的可能性。例如，對於臺灣內部的權力架構而言，過去主流歷史詮釋，主要呈現不同支配者由上而下的觀點；相較之下，臺灣史不能不更著重臺灣社會內淪為弱者與底層的人民之聲。此外，對於臺灣的對外關係而言，過去臺灣曾被視為各帝國的邊陲，並未享有應有的主體性。為了從中尋找臺灣本身的一貫脈絡，臺灣史研究者願以殖民經驗為立足點，嘗試從不同國別史中抽出臺灣的內在聯繫及傳承，藉此浮現其主體性。臺灣史也拒絕接受過去被強國與帝國所壟斷並斷絕的東亞史連結。相反地，探尋過去視而不見的銜接，延伸嘗試尋找散逸於各地的弱者間的脈絡，追求不同邊境間恢復由下而上的連帶。不言而喻，對於臺灣史而言，邊緣與底層的觀點不僅是匯集學者們的基本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書寫策略。惟礙於作者專攻領域，本文以下僅以日治時期為例，針對臺灣史學界近年來底層或邊緣研究的選題、現階段的研究重點及未來遠景等，分別概述。

2. 隱匿的足跡：為弱勢群體寫史

首先，從低收入者、遊民、災民、身障者、慢性病患、到移民及移工等，這些現今臺灣社會角落中的不同弱勢群體，究竟何時以及如何受到史家的青睞，並成為書寫對象呢？雖然早自日治時期，部分弱勢群體個別被編入社會福利史、法律史及醫療史等不同相關專史，成為佐證的題材，但他們從「底層」及「邊緣」之名提升成為研究主題，則是 2012 年問世的《看不見的殖民邊緣》。⁷⁴

考量到韓國同樣曾經歷日本殖民統治，早在 1980 年代就已大量出現許多以日治下層社會為主題的論著，⁷⁵ 儘管兩地戰後的經驗不同，難免令人質疑臺灣社

⁷³ 許雪姬，〈臺灣史研究三部曲：由鮮學經顯學到險學〉，頁 71-100。

⁷⁴ 陳姪媛編著，《看不見的殖民邊緣：日治臺灣邊緣史讀本》（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⁷⁵ 姜萬吉，〈일제시대빈민생활사연구（日治時代貧民生活史研究）〉（首爾：創作社，1995）。

會為何較晚才關注相關課題。然而，如何界定社會中的底層或邊緣，並非固定不變，而是反映出該社會的發展階段，顯出千姿百態，包括看似比臺灣早出現相關討論的韓國學界。

戰後韓國歷史學脈絡中，1980年代下層社會史的研究主要著眼於經濟貧窮，其主題農村移民、「火田民」、「土幕民」、粗工、待業者等；到2000年代，傳承此一學術傳統的學者們，轉向關注同性戀社群、犯罪者、精神病患、在朝華僑、旅外韓人、外籍移工、外籍配偶、性勞動者等，藉此找回過去視而不見的群體。⁷⁶由此可見，社會對於底層或邊緣的界定及認識並非靜態，而是按照其發展階段不斷應變，要求史家從歷史脈絡中挖掘並鑑證其實際軌跡。

臺灣史也不例外。十年前號稱臺灣史首本底層史讀本的《看不見的殖民邊緣》，列出窮人、娼妓、浮浪者、受刑人、不良少年、阿片吸食者、精神病患、漢生病患等八個弱勢群體，但這並不等於日治臺灣底層史的全貌。未來新一代的底層史必須為我們今日仍視而不見的「他者」重新發聲。儘管如此，底層史書寫並非單純挖掘這些埋沒於史料的存在，並讓他們有了歷史上的位置與脈絡就罷了。

3. 邊緣群體敘事：重見歷史中的社會機制

其次，以當代日治時期底層史書寫為例，無論是從漢生病、阿片吸食者、賣身婦女們到受刑人等個別群體的專史，抑或是他們集體匯出的邊緣或底層社會史，找回其在歷史中的位置與脈絡，還透過他們如何出現並演變的歷史經過，進一步突顯其背後的社會機制——即「殖民地社會排除機制」。

回顧戰後日本殖民地史學界的進程，1980年代風靡一時的「資本主義萌芽論」與「殖民現代化論」之間的攻防，到了2000年代，飽受「殖民現代性論」之嚴厲批評。簡言之，以往學界因過度致力如何斷定日本殖民統治的功罪，討論也主要集中在殖民統治究竟是榨取當地社會並剝削其自主發展的可能性，抑或促使其快速現代化，反而忽略了現代化或資本主義化本身絕非判斷歷史經驗的標準。如此一來，在「殖民現代性論」的興起與呼籲之下，學界討論重點不再僅是殖民地社會的現代化及資本主義化本身，而是在殖民統治下的現代化，究竟伴隨何種

⁷⁶ 鄭根植，〈차별 또는 배제의 정치와 소수자의 사회사 재구성（超越歧視與排除的政治，重構弱勢群體的社會史）〉，《경제와사회（經濟與社會）》（首爾）100（2013年10月），頁183-208。

副作用並深化各種社會問題，導致社會結構的畸形化。⁷⁷ 易言之，上揭弱勢群體們與其說單純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浮現於臺灣社會，毋寧說是在殖民統治所帶來的強制性改造過程中，被迫排除至社會結構之邊界。

在日本殖民權力所主導的臺灣現代化過程中，不少人們以「社會安寧」為由，被殖民警察或殖民司法貼上受刑人、無賴漢或不良少年等標籤，並也因此被迫排除至監獄、收容所或教化機構等不同隔離空間。不僅如此，臺灣的自然環境被日本統治者視為「瘴癘之地」，為了從中劃定健康衛生的安全範圍，醫療衛生也用來成為另一個排除邏輯。如此一來，吸食阿片不再是人人得以依據個人喜好或經濟考量享受的嗜好品項，而列為公權力致力根絕的陋習，只授與特權予特定資格的人群。個人一旦被貼上阿片癮的標籤，必須列在殖民地警察的管理對象，成為社會中的另類群體，在人身、空間上受到取締與限制。賣身行為也一樣，性病在日本殖民統治者眼中，被視為公共衛生的主要威脅，公娼制度就用來限制賣身行為，以公權力賦予資格者——「公娼」為限。此一過程在臺灣不僅製造出「公娼」這一全新的人群，同時也從社會排除性工作者。由此而言，思考日治時期的底層或邊緣社會，不僅提供我們重新深思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社會結構與其演變過程之有效策略。更重要的是，不同於制度或政治史，這也讓我們站在社會基層的觀點，由下而上透視殖民地臺灣社會的另一個運作機制。

4. 殖民邊緣紐帶：尋覓臺灣島外的聯繫

最後，底層與邊緣的觀點，將進一步為臺灣找回與島外鄰境間的連接與脈絡。臺灣多次處於不同帝國的殖民狀態，導致臺灣難以與周圍的鄰近區域接觸，自主性發展對外關係。尤其在日治時期，臺灣附屬於日本帝國之下，不僅被剝奪其獨立外交關係，少數的跨界交流也都集中於日本帝國版圖內，包括人流、物流等有形的聯繫，甚至涵蓋情報與知識等無形資本的匯流。

詳言之，臺灣作為日本帝國成員，由於處於其最末端的殖民地，所以未必能享受與其他帝國成員之間更加活躍的交流。相反地，在以日本母國為中心，輻射出的帝國內部權力結構下，臺灣難以與朝鮮、滿洲、北海道、沖繩或南洋群島等

⁷⁷ Gi-Wook Shin and Michael Robinson, eds., *Colonial Modernity in Kore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9).

帝國內其他邊疆地區建立更為緊密的聯繫，其關係網絡必須先被收斂到母國的中心。因此，日治時期臺灣的對外關係，不僅在範圍上難以超越日本帝國疆域，而且在結構上容易受限於母國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之中。⁷⁸

底層與邊緣的歷史觀點提供我們對此質疑的線索。底層史與邊緣史的討論對象，是被殖民統治權力從社會架構中排除的「他者」們，這也逼迫他們為了生存尋找出路，導致從中不少人們漂流到海外謀生，建立鄰區的「連接」。舉例而言，臺灣與朝鮮間，究竟有何程度的實際交流，仍困惑相關學者。從日本官方統計，可以發現旅臺朝鮮人最大部分是娼妓與船員——也是在極大經濟壓力下被社會排擠到朝鮮外的底層人。不僅如此，與臺灣距離最鄰近的琉球群島，在戰前也有大量女性流動到境外，其中不少人到臺灣及澎湖等地成為底層勞動人口。儘管人口上並沒有像上述例子那麼多，臺灣社會也確實排擠部分底層人口至島外，包括到廈門下海的不少臺灣婦女們。

若將視野再擴大，包括朝鮮農民到滿洲的情況，不難發現這些不依賴——或迴避——日本殖民權力的帝國網絡內人口移動，明顯不同於過去所謂的「帝國人才周流」模式——亦即在帝國內系統性地規劃各地行政體系的人才分配之呈現。⁷⁹ 回溯 1990 年代後半，日本史學界關於帝國史呼籲，為了書寫真正符合實際歷史樣貌的殖民地史，必須擺脫殖民者的日本觀點，而立足於被排除的弱勢群體，深思他們自行尋找的網絡，由此深思臺灣與島外間的實際連接與歷史脈絡。⁸⁰ 當然，由邊緣及底層探索臺灣的對外關係，不僅僅彌補日本帝國史書寫中的缺陷與空洞，更重要地，對臺灣史書寫而言，這得以讓臺灣史擺脫殖民地史研究中的既有權力機制，爭取真正符合於其原貌與實況的對外關係史。

（三）陳宗仁，〈海洋、圖像與世界：非典型史料與臺灣史研究〉

我今天講的是「海洋圖像與世界：非典型史料與臺灣史研究」，大會擬的這個

⁷⁸ 岡本真希子，《殖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台湾総督府と帝国日本》（東京：三元社，2008）。

⁷⁹ 山室信一，〈植民帝国・日本の構成と満州国：統治様式の遷移と統治人材の周流〉，收於ピーター・ドウズ（Peter Duus）、小林英夫編，《帝国という幻想：「大東亜共栄圏」の思想と現実》（東京：青木書店，1998），頁 155-202。

⁸⁰ 駒込武，〈「帝国史」研究の射程〉，《日本史研究》（京都）452（2000 年 4 月），頁 224-231。

題目，我覺得非常貼切，但看起來像是退休感言！我剛剛聽了我的同仁陳培豐講聲音，陳延媛講邊緣的人群，突然覺得跟他們在同一個場合報告有種榮耀感。他們作為史學工作者，開闢了一個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的領域，就好像登山者找到一條新的山路，後來的人可以跟著他們的腳步走。同時，也開始感受到我的研究的重要性，也許我的圖像研究也可以達到這種程度。

我的題目包含了五個概念：海洋、圖像、世界、非典型史料跟臺灣史研究，以下是我對這些概念的想法。首先，是典型跟非典型史料。其實對於研究者而言，無所謂典型與非典型，能夠用的素材就是史料，所以這概念在研究上不是很重要，但是對於教學或是史學討論，也許有它的必要性。我的想法是所謂典型跟非典型，它的界線並不固定，當我們在 1980 年代使用土地契約做研究的時候，那個時候也許是非典型史料，然後經過一些年後，做的人多了，就成為典型史料，所以它的概念是不固定的。

至於圖像，早就有學者做研究，藝術史都在討論圖像，比如史語所的刑義田教授也使用圖像做研究，⁸¹ 所以圖像史料其實很難說典型或非典型。但是，對我或對於臺灣史學界來講，圖像的研究還應該加強，圖像史料的潛力還沒有完全發揮。我們看到一份奏摺，會覺得很安心，常認為把它讀過就知道意思了，然而對於一幅古地圖，或許覺得那就是一幅過時、不準確的老地圖，就忽略過去。但圖像史料也是過去歷史的產物，與文字史料一樣，都是一種文本。透過圖像的解讀，一樣能讓我們去碰觸到某種歷史實態，特別是當時人們的空間觀或抽象思維。

上述五個概念中，對我而言非常重要的是海洋與臺灣史。我的研究基本上討論的是臺灣跟外在世界的關係，所以撰寫博士論文時，使用的概念叫「東亞海域史」，⁸² 當時並沒有海洋史的想法，跟著曹永和老師上課，就是以東亞海域作為一個空間研究臺灣跟外在世界的關係。所以我博士論文改寫成書後，書名是「雞籠山跟淡水洋」，小標題就是「東亞海域與臺灣史研究」。⁸³ 另外，我在臺大教書

⁸¹ 刑義田，《立體的歷史：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增訂三版）。

⁸² 陳宗仁，〈東亞海域多元勢力競爭下雞籠、淡水地位的轉變（1400-17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⁸³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時寫作或發表的一些論文，如討論十六世紀月港的開放、十七世紀上半葉的福建政局、一個澳門華人 Salvador Díaz 被荷蘭東印度公司俘虜的故事，或是郁永河書中描繪東西洋的〈字內形勢圖〉，⁸⁴ 這些主題其實跟臺灣沒有直接關係，但都在臺灣周邊或是涉及臺灣。所以那些年我很重要的研究主題就是東亞海域史，特別關注海域史裡臺灣跟外在世界的關係。2020 年臺史所成立海洋史研究群，曹老師提出的「臺灣島史」、「東亞海域史」這類概念，好像找到可以靠泊的港口。

再來是圖像研究，其實這是意料之外的研究課題。2002 年我在博士畢業後找工作，剛好國家圖書館要徵人，因為他們購買了四千多件日治時代的明信片，是一位收藏家畢生所藏，圖書館的館員編目後，需要找一個歷史學專業的人整理。我很幸運地進入國家圖書館工作，過幾天館員就推了一車子的明信片到我的面前，說要整理，我的博後生活就此展開。我有一整年的時間都在讀這些明信片，上面的文字不多，所以我每天都盯著圖像看，在此之前從未想過我會進行圖像的研究。這批圖像非常豐富，應該要有更多研究日治時代的人去利用。

整理完圖像，國家圖書館希望能夠出版成冊，但怎麼出版？我之前只會使用「典型」的文字史料進行解讀，但現在只有圖像，此時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會是我從事圖像研究的起點。四千多張明信片中，有八百多張與原住民有關，主題較明確，我由此編了《世紀容顏：百年前的臺灣原住民圖像》，分成上、下兩冊介紹頭目、勇士、傳統工藝、日常生活、服飾及家族人物等主題。⁸⁵ 同時也看到太多原住民的槍，覺得很特殊也很有趣，所以寫了一篇有關槍的文章。⁸⁶ 我的作法很簡單，把這些槍的圖像通通集中起來再做分類，分類完了再寫作成文。完稿那一剎那令

⁸⁴ 陳宗仁，〈西班牙文獻中的福建政局（1626-1642）：官員、海盜及海外敵國的對抗與合作〉，收於呂理政主編，《帝國相接之界：西班牙時期臺灣相關文獻及圖像論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6），頁 323-338；陳宗仁，〈略論晚明月港的開禁問題：兼論通商船、徵商稅與福建軍情之轉變〉，收於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十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8），頁 101-142；陳宗仁，〈1626 年的大員港灣：一位澳門華人 Salvador Díaz 的觀察與描繪〉，收於戴文鋒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II》（臺南：臺南縣政府，2010），頁 1-31；陳宗仁，〈前往東、西洋：〈字內形勢圖〉解析及其地緣政治想像〉，《臺灣史研究》19: 3（2012 年 9 月），頁 1-46。

⁸⁵ 陳宗仁主編、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世紀容顏——百年前的臺灣原住民圖像（上冊）：頭目、勇士及傳統工藝篇》（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陳宗仁主編、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世紀容顏——百年前的臺灣原住民圖像（下冊）：日常生活、服飾及家族人物篇》（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

⁸⁶ 陳宗仁，〈近代臺灣原住民圖像中的槍：兼論槍枝的傳入、流通與使用〉，《臺大歷史學報》（臺北）36（2005 年 12 月），頁 53-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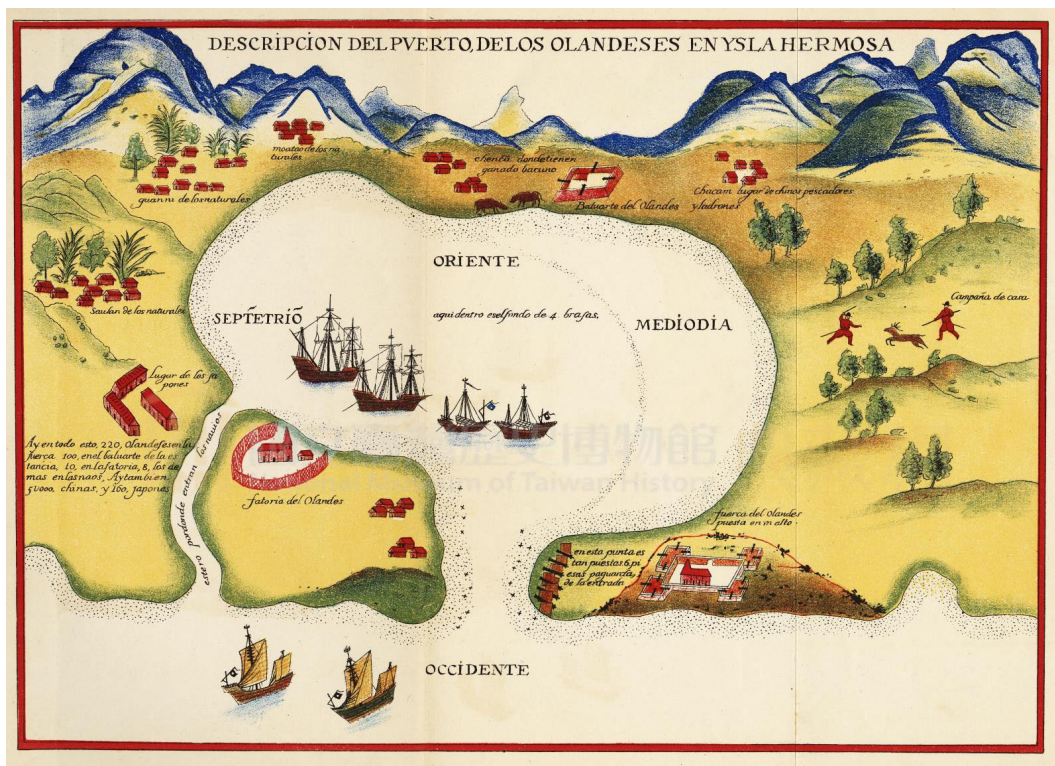
我有點震撼的是，從圖像可以觀察到在二十世紀山區原住民部落裡，從早期的火繩槍到最先進的連發槍都可以找得到。換言之，整個西方軍事科技的發展好像水流一樣，有個小支流漸漸流到原住民部落的池塘裡，在池塘裡可找到這三百年西方槍枝發展史的過程。不過，當時覺得只是為了寫篇論文，尚未意識到圖像研究的重要性。

之後我到臺大教書，因為閱讀曹老師所寫歐洲古地圖的文章，覺得不易理解，某天就把文中引用的地圖統統影印、裁剪，重新分類，按自己的想法，寫了一篇論文，從葡萄牙地圖的演變，解釋臺灣為什麼在十六世紀末畫成三個島。⁸⁷ 這時候慢慢感覺到，觀察、思索圖像本身可以解決一些歷史問題。然後 2008 年又寫了〈1626 年的大員港灣：一位澳門華人 Salvador Díaz 的觀察與描繪〉，這幅西班牙地圖（圖八）相當常見，但通常只被用來證明荷蘭東印度公司已經佔領了大員，但我們應該去讀繪者的「心思」，而不是一眼就看過去。這幅圖的關鍵在於三個景物的描繪：東印度公司的城堡、商館以及位在赤崁的小城堡，繪者其實用這三個景物作為整幅圖像的基本架構，這個三角架構是繪者想要強調並引領讀者關注的，他的「心思」是希望西班牙人來打大員，所以對他或西班牙人來講，這三個景物才是重要的，其他的景物也許是真實的，但只是陪襯。在閱讀一幅或多幅圖像時，希望可以讀到繪者的心思，一幅圖像裡可能描繪很多細節，我們可以進行分類，但應該進而詢問有那些細節、類別是特意畫出，希望讀者理解，這就是繪者「心思」之所在，如同這幅地圖的繪者希望西班牙長官理解荷蘭人在大員的相關設施。所以圖像本身有它的主體性，而不只是一幅「證明」新港社在什麼位置或是某些文字史料的佐證。

2010 年，我又見到一幅非常棒的圖像，大家都很熟悉郁永河的《裨海紀遊》，但原本書裡竟然有一幅地圖（圖九），當時我去輔大歷史系擔任學術會議的評論人，⁸⁸ 發表者周翔鶴教授找到了郁永河的圖，進行初步的研究，我評論完後，意

⁸⁷ 陳宗仁，〈Lequeu Pequeño 與 Formosa：十六世紀歐洲繪製的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臺大歷史學報》41（2008 年 6 月），頁 109-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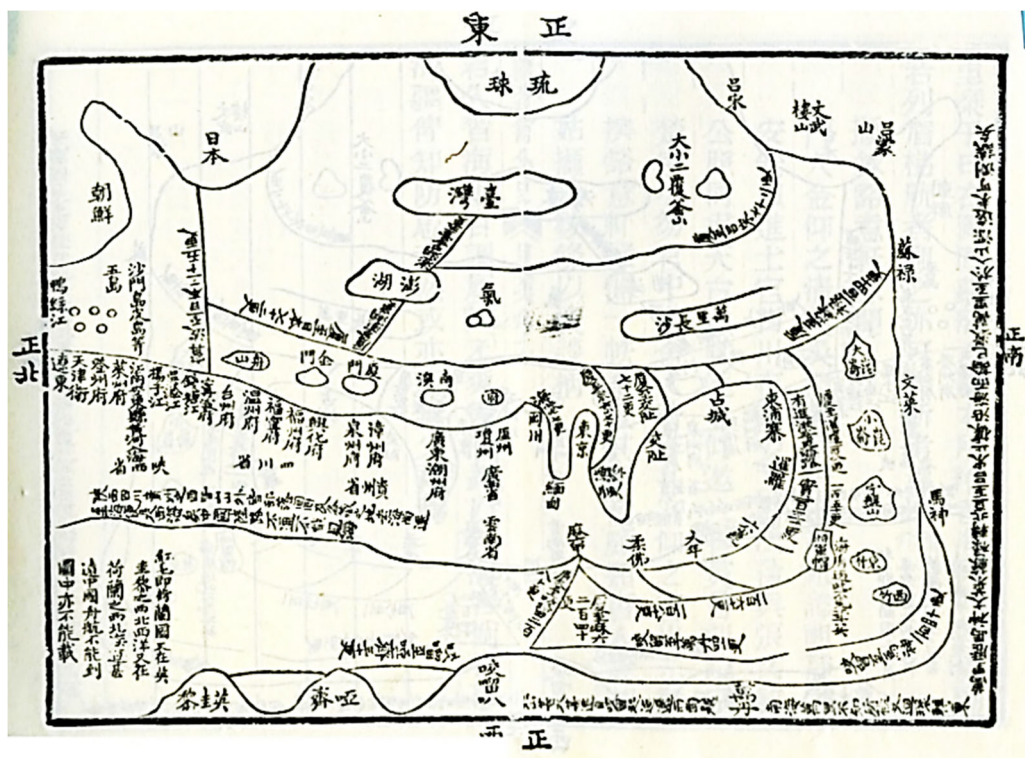
⁸⁸ 2010 年 5 月 14-15 日，輔仁大學歷史學系舉辦「第六屆文化交流史暨方豪教授百年誕辰紀念：先驅、探索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廈門大學周翔鶴教授報告的論文是〈從郁永河《裨海紀遊》宇內形勢圖說明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後來正式發表的論文是〈胸中的航海圖：郁永河《裨海紀遊》手繪“宇內形勢圖”（示意圖）研究〉，刊於《海交史研究》（泉州）2014: 2（2014 年 12 月），頁 56-74。



圖八 西班牙文地圖〈大員港圖〉

資料來源：〈西班牙人繪製艾爾摩沙島荷蘭港口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線上博物館」，下載日期：2023 年 12 月 1 日，網址：<https://the.nmth.gov.tw/nmth/zh-tw/Item/Detail/486a1000-75dd-4949-b37d-0548cfdefee8>。

猶未盡，等了兩年，就在期刊發表〈前往東、西洋：〈字內形勢圖〉解析及其地緣政治想像〉。這時期我已習慣從圖像的本身看問題，郁永河的這幅圖可以稱為〈字內形勢圖〉，呈現他對於整個東亞海域的理解，時代大約是在十七、十八世紀之際，使用的仍是十六世紀已流傳的東西洋概念。要閱讀這幅圖就要在圖的中心位置找到廈門島，再以這個為中心點，將閩粵的海岸線視為一條水平線，線的上方是東方，即東洋，下邊是西洋，整個東亞海域就用東西洋的概念呈現出來，但更重要的是郁永河使用一個舊的結構畫出他認知的、最新的東亞海域世界。在這樣的研究裡面，就是以圖像描繪的內容作為文章的架構、敘事的主線，而不再是以文字史料為中心的論述，也就是在這一幅地圖裡，要去分析整幅圖的架構、布局和它的思維為何？



圖九 海域圖〈字內形勢圖〉

資料來源：陳宗仁，〈前往東、西洋：〈字內形勢圖〉解析及其地緣政治想像〉，頁 40-41。

2012 年，謝國興所長與北京故宮博物院達成共同研究、出版《臺灣風俗圖》的協議。因為先前編輯《世紀容顏》的經驗，當我看到這一套圖時，我感覺到它畫了什麼與想要畫什麼，日治時代與晚清的圖像彼此間有著某種連結，彷彿存在某些相似性與差異性，所以我就跟謝所長說我可以進行編注，後來花了一整年的時間編寫《晚清臺灣番俗圖》。⁸⁹ 在閱讀的過程中，我試圖去理解繪者的敘事手法及想要表達的東西，譬如書中第 28 幅〈番婦紡織圖說〉(圖十)，這一幅圖可以看到原住民的房屋前，四名婦女與一個小孩正在工作，彷彿在表現田園生活的寧靜、和諧，但其實這五個人代表製作衣服的五個過程。圖中小孩左手拖著一些苧麻，小孩對面的婦女正在剝麻，再交由圖中最右的婦女紡成線。圖中央的婦女使用織布機將麻線織成布，其背後的婦女則拿鉞縫布，製成衣服。

⁸⁹ 陳宗仁編撰，《晚清臺灣番俗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3)。



圖十 〈番婦紡織圖說〉

資料來源：陳宗仁編撰，《晚清臺灣番俗圖》，頁158。

繪圖者不是單純地描繪一個共時性的紡織景像，而是利用這五人的動作表達五種工序，呈現從採麻到製衣的整個過程，雖然省略一些步驟（如清洗、曬麻），房屋與織布機亦屬想像之物，但繪者的企圖明顯可見。所以它不是一幅現實情景的圖畫，而是將功能性的場景組合成一幅畫。所以我們應該去辨析出一幅圖像裡面，它的真與假、實與虛，進而讀出繪者的企圖與心思。再如第30幅〈臺南北番社種薯圖說〉（圖十一）也是一例，圖中原住民正在田裡耕種，但其實圖中有三個場景：近景男子兩人，一人持棒挖土，另一人將番薯藤插入土中，這是在「栽種」。



圖十一 〈臺南北番社種薯圖說〉

資料來源：陳宗仁編撰，《晚清臺灣番俗圖》，頁 166。

遠方三個小孩，一人至河邊取水，一人澆水，另一人正前往河邊取水，澆水意指「培植」作物。圖中央有一婦女，手中拿著帶葉的番薯，代表正在「採收」。三個場景分別表現栽種、培植、採收三個概念。這同樣不是共時性的場景，而是藝術性地拼合三個場景，呈現一種歷時性的過程。所以我在研究圖像的過程中，慢慢地學習不同繪者的表現手法。

2013 年我編完《晚清臺灣番俗圖》後，對於圖像的研究有了更多自信，又恰好看到英國牛津大學收藏的 *Selden Map*，這幅中文地圖裡有葡萄牙人描繪的日本圖形，立刻引起我的興趣，由於先前做過類似的研究，於是開始寫這幅地圖的研究

回顧，並針對中國與朝鮮的描繪做了一些研究。但是，我又被其他有趣的事吸引過去，先是蔣元樞常熟家鄉的人，找我談重新出版《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的計畫，接著又隨洪麗完去做臺灣南部的沿山研究，因而我自 2015 年起轉而進行十八世紀的圖像研究。過了幾年，覺得 *Selden Map* 甚受學界重視，但有些論著只是臆想，於是從 2019 年開始專心寫作，又因疫情期間窩居家裡使得進展加快，於 2021 年完成書稿，一年後出版《*Selden Map* 與東西洋唐人：地理知識與世界景象的探索（1500-1620）》，⁹⁰ 這本書可以代表我對圖像研究一個比較成熟性的作品。

當我們研究圖像，分析它的構圖、布局，甚至繪者的思維後，慢慢可以感受到圖像它所存在世界與繪者想像的「世界」，亦即繪者在畫一幅地圖時，畫了某些島嶼、寫了某些地名，在刪節與添加之際，最後會把生活其間的世界與自己對世界的認知畫進圖像裡，這就是我寫 *Selden Map* 這本書的構想。學術界在過去十年已經出現很多的論著，有人說它是李旦、鄭芝龍畫的地圖，有人說它是一種新的繪圖技術，但我有不同的解讀。研究這幅地圖的難度在於只有地圖本身，而無相關的文字史料可以參考，等於只能就圖論圖。

我按一個個地圖局部分析，認為它展現的是十七世紀初呂宋唐人的一種空間想像，繪者畫出他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畫出他的唐山樣貌，畫出唐人在哪些港口活動。所以對於圖像的研究，如何從局部分析開始，去探索繪者的心思、企圖，直到其自身所存在的那個世界，才是解讀的重點。

在這本書裡，我談的「世界」，不是指人類的世界，而是指某人或某群體的世界，比較像布勞岱（Fernand Braudel）所談的「經濟世界」。這本書對我來說，就是在海洋史的領域中，依據圖像與地圖史料探討唐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包含他們對生活周遭的認知與想像。近年來，我對唐人研究充滿了好奇，因為在華僑、華人史的研究裡，「唐人」是個被忽略的概念，今年（2023）我們海洋史研究群的同仁到檳城、麻六甲去考察，因為臺灣跟檳城都是唐人的世界，是可以進行比較的。我也跟清大李毓中長期合作，出版呂宋唐人的教義、辭典書籍，也跟臺師大康培德去荷蘭萊頓大學找尋荷蘭人搜集的唐人資料，這些都是過去比較被忽略的、非典型的史料。以上簡短的報告，就是我這幾年進行研究工作的回顧。

⁹⁰ 陳宗仁，《*Selden Map* 與東西洋唐人：地理知識與世界景象的探索（1500-1620）》（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2）。

（四）林玉茹，〈商業網絡的多重性：全球尺度下的臺灣社會經濟史〉

我自 2019 年 9 月以來主持「長崎泰益號文書解讀工作坊」，又剛出版從全球史比較視野探究的拙作《向海立生：清代臺灣的港口、人群與社會》，⁹¹ 而被邀請來談〈商業網絡的多重性：全球史尺度下的臺灣社會經濟史〉。在座有眾多專家學者比我更有資格討論這個主題，但為了慶祝臺史所三十年所慶，只好不揣淺陋來說說個人粗淺的看法。

今年（2023）7 月 4 日，若林正丈教授的所慶專題演講，他試圖從政治史學者角度，尋找今日世界讓臺灣成為臺灣的歷史脈絡，也就是「臺灣的來歷」。之前，我也曾經看到一位人類學者，手中拿著紙條思索「文化是什麼？」而身為一個臺灣社會經濟史研究者，應該問什麼樣的問題呢？我向來以社會經濟史，特別是經濟史、商業史為主要研究領域，這個問題也始終縈繞於心。對我而言，經濟問題是人類社會和文明發展的重要原動力。臺灣社會經濟史在這個面向上，究竟可以提供何種研究貢獻和價值？

眾所周知，戰後臺灣經濟最初從進口替代往出口貿易導向發展，更從 1970 年代末期的新興工業國（NICS）變成 1980 年代的新興工業經濟地區（NIES），開始受到舉世矚目。⁹² 高棣民（Thomas B. Gold）以「臺灣經濟奇蹟」來指稱。⁹³ 直至今日，臺灣作為亞洲四小龍的地位不僅始終屹立不搖，近五年來，半導體產業更是執全世界之牛耳，成為「護國神山」，對全球高科技產業和經濟發展貢獻甚鉅。另外尚有不少產業，也獨步全球或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進一步構成「護國群山」。更值得注意的是，臺灣歷史上，由傳統農業向工業、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向來大多是外來技術和資本輸入島內，現在卻隨著臺商企業全球布局和商業網絡的展開，出現技術和資本的島外輸出，甚至反過來向美國、日本以及歐洲等先進國家輸出的現象。臺灣經濟實力達到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高點，根據 2023 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的世界競爭力評估，臺灣排名第六，是 2012 年

⁹¹ 林玉茹，《向海立生：清代臺灣的港口、人群與社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2）。

⁹² 隅谷三喜男、劉進慶、涂照彥，《台灣的經濟：典型 NIES の光と影》（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1992），頁 I；若林正丈，《台灣：分裂国家と民主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1992），第四章。

⁹³ Thomas B. 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86).

以來最佳的表現。⁹⁴ 我們或許可以說，臺灣正在締造戰後以來第二次、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奇蹟。然而，偌大面積、資源有限的海島臺灣，為何得以在全球兩百多個國家間經濟表現如此突出？

過去，一般咸稱戰後初期臺灣經濟的發展，政府政策或國家機器扮演重要角色，不過如從長時期歷史來觀察，臺灣經歷不同政權的統治，每個時期的經濟成就往往並非來自政府的精心擘劃。那麼，臺灣經濟發展的長時期動力是什麼？經濟的發展或變遷，又如何影響臺灣社會的形構；反之，臺灣社會結構與經濟間的關係為何？這應該是社會經濟史研究者終極關懷的課題，更突顯臺灣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必要性和價值。

事實上，除了國家政策的影響之外，臺灣民間商人和企業自身高度的應變能力、積極冒險以及前仆後繼的社會性格，可能才是長期經濟發展和一再突破的關鍵。以我個人的研究經驗而言，可以看到 1895 年因為日本割臺而回到泉州的鹿港謙和號許志湖一家，一旦形勢稍微底定，立刻做起泉州永寧和鹿港之間的貿易，網絡橫跨上海、廈門、淡水以及鹿港。⁹⁵ 臺灣第一代的現代型商人，來自打狗的王雪農更特殊，直接由橫濱，轉進當時三郊商人團體勢力處於真空狀態的臺灣首府臺南，更擅於作為臺灣商人和日本殖民政府之間的文化仲介，而一舉變成日治初期臺南最有影響力的紳商。⁹⁶ 很明顯地，在不同時期，臺灣商人能迅速地因應國家政策與市場趨勢的變動，在原有商業網絡基礎上，靈活地重新與外來政權和商人建立新的網絡關係，而掌握嶄新的經濟機會或避開風險。隅谷三喜男、劉進慶以及涂照彥等人，探究戰後臺灣經濟的發展也指出：如與韓國比較，臺灣經濟的特色是企業的行動模式具有投機的、賭博式的商人性格。或是高承恕等注意到的，臺灣中小企業爭取做頭家、頭家娘的現象。⁹⁷ 這種臺灣社會普遍存在的企業精神或商業性格，至今仍屢見不鮮，甚至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或隔壁鄰居，但它是如何

⁹⁴ 陳素玲，〈瑞士洛桑管理學院 2023 年世界競爭力排名 臺灣晉升至全球第 6 名〉（2023 年 6 月 20 日），「聯合新聞網」，下載日期：2023 年 7 月 22 日，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7238/7247363>。

⁹⁵ 林玉茹，〈商業網絡與委託貿易制度的形成：十九世紀末鹿港泉郊商人與中國內地的帆船貿易〉，《新史學》18:2（2007 年 6 月），頁 61-102。

⁹⁶ 林玉茹，〈跨國貿易與文化仲介：跨政權下臺南第一富紳王雪農的出現〉，《臺灣史研究》27:4（2020 年 12 月），頁 35-82。

⁹⁷ 隅谷三喜男、劉進慶、涂照彥，〈台灣の經濟：典型 NIES の光と影〉，頁 324-326；高承恕，〈頭家娘：臺灣中小企業「頭家娘」的經濟活動與社會意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形成和演變的呢？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必須從淵源來觀察，亦即有必要自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以來進行長時期歷史的探究，闡明「臺灣社會的商業性格」。

近代中國商業史大師郝延平曾從商業革命角度指出，商業革命與海洋有密切的關係。他進一步提出所謂中國三大商業革命：宋代、1820-1880年，以及1950年代晚期產生於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的第三次商業革命，因為政府推行了一連串的經濟政策，而打造出臺灣經濟奇蹟和臺灣經驗。⁹⁸ 然而，從臺灣史角度來檢視，三階段論卻大部分不適用。以晚清而言，郝延平指出1870年代商業革命達到了高峰，1883年的經濟恐慌象徵性地結束了晚清的商業革命。很有趣的是，1880年代正是晚清臺灣經濟發展進入新高峰的開始，特別是臺灣建省之後，新式郵政電報體制和網絡的建立、新貿易公司的出現、金融機構和金融資本的產生，以及更進一步的都市化。⁹⁹ 帝國的邊陲、移墾社會的後進性，及臺灣受到矚目的茶和樟腦產業在國際市場的地位，均是造成差異的因素。換言之，我們仍必須回到臺灣本身的在地條件和歷史遭遇來觀察。

儘管不能否認，如先行研究者指出，由於移民、統治政權以及地緣性商業網絡的連結，臺灣商業傳統仍具有中國元素的傳承，但也會因為國際環境、政策、在地市場特性而蛻變，¹⁰⁰ 更基於在地條件而發展出很「臺灣式」的商業文化。嗅覺敏銳、市場應變力強以及高度出口貿易和逐利取向的社會型態，即是重要特徵。

另一方面，臺灣是一個海島，基於有限資源或區域分工，長期以來都必須發展島外貿易。十六世紀，早在荷蘭人來之前，因位置優勢浮現，中國、日本的海盜和海商已經來到臺灣交易。荷蘭、西班牙時代，進一步將東亞商業網絡擴大到全球。鄭氏王朝時代，在中國沿海遷界之下，持續經營亞洲商業網絡，同時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貿易。直至清朝雍正初年，臺灣仍與呂宋、日本貿易往來，之後逐

⁹⁸ 郝延平，〈中國三大商業革命與海洋〉，收於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六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7），頁9。

⁹⁹ Yu-ju Lin, "Transnational Networks of Human Resources and Knowledge in East Asia: A Case Study of Taiwan Merchant Wang Xuenong (1870-1915) and His Trading Compan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Cambridge), accepted; 林玉茹，〈向海立生：清代臺灣的港口、人群與社會〉。

¹⁰⁰ 林滿紅在〈臺灣商業經營的中國傳承與蛻變〉一文中，以宏觀的角度指出臺灣的中國傳承包括家族企業、合夥、中小企業、宗教關係密切以及宗教力量之影響等五種。但是，也因為市場力量和國家因素而產生蛻變。該文收於黃富三、翁佳音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頁1-44。

漸建立僅與福建對渡的正口貿易體制。但因移民偷渡、走私貿易盛行，起初雖僅限於中國東南沿海地域，但至乾隆中後期，商業網絡已往南北沿海各地擴散。¹⁰¹ 1850年代，華洋走私貿易的展開，進一步讓臺灣再次與亞洲、全球連結，直至今日。

長期以來，臺灣商業貿易網絡雖擺盪於亞洲、中國以及全球網絡中，但因面向海洋而提供了無遠弗屆的可能性和創新機會，更進一步形塑島民重商趨利、外銷優先的商業性格。舉例而言，寧願進口地瓜來食用而出口稻米，且最先進和品質最好的本地產品外銷先於內銷。即使臺灣仍處於開發中的農墾狀態，農產品主要是為了外銷，但為了追求最高利潤，而不斷且盡可能擴張商業網絡，由中國、亞洲到全球。商業網絡也不僅是對外的持續擴展，更往島內形成城市內部之間、內陸與沿海之間、上下游關聯產業鏈（垂直整合或一條龍）之間，以及多元族群之間的合作和連結，展現商業網絡的多重性和多元性。

長期以來，在商業網絡的島外擴張下，臺灣不斷移入各種人群、商品、技術、資本以及制度，促使社會結構和生活形態的變遷。對於這樣的變化，我們往往太過簡單地化約為中國化、西化以及日本化，不僅忽略外來和本地，或是多元元素的相互交融，更看不到長時期動態的演變和原因。臺灣商業貿易史的研究，也向來著重於出口商品，而較少注意全球多源進口或移植的各項元素對於臺灣社會形貌的衝擊和影響。

在前人成果累積下，臺灣社會經濟史研究已經可以從長時期而宏觀的角度觀察臺灣經濟的發展，如吳聰敏的名著《臺灣經濟四百年》，¹⁰² 或如黃富三提出「農商經濟連體型」解釋性概念。¹⁰³ 不過，除了總體經濟分析，如同前述，四百年來臺灣逐漸打造出獨特的臺灣經濟奇蹟或經驗，仍有必要進行商人和企業行動者的探究。與國外相比，由於臺灣商人、企業家並不重視保留歷史紀錄，個別企業或商人史料向來很少，更沒有日本編輯企業史（社史）的傳統。¹⁰⁴ 幸運的是，2012年，陳東華先生捐贈長崎泰益號文書給本所檔案館典藏，自2019年以來，本所

¹⁰¹ 詳見林玉茹，《向海立生：清代臺灣的港口、人群與社會》。

¹⁰² 吳聰敏，《臺灣經濟四百年》（臺北：春山出版有限公司，2023）。

¹⁰³ 臺灣先商後農的農商經濟連體型態，迥異於世界各地的發展狀態，參見黃富三，〈臺灣農商連體經濟的興起與蛻變（1630-1895）〉，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頁3-36。

¹⁰⁴ 日本統治時期雖然留下少數的社史，如《臺灣銀行四十年史》，但戰後卻幾乎沒有延續這項傳統。相對於日本的三井、三菱等財團甚至有典藏企業內部的文庫或史料館，臺灣企業大多不重視自己的歷史。

也開始解讀長崎泰益號文書中臺灣商號所產出的商業書信，最先以數量最多、臺北和基隆地區中介和核心商號老源順書信為中心。經由初步的解讀，我發現這批商業書信可以做為探究臺灣的商業性格以及多重的商業網絡特徵的一手史料。我們知道，晚清臺灣各地港口依據其規模，各自構築亞洲或全球的商業網絡，但仍以與中國沿海貿易為主。1895年，臺灣突然割讓給日本之後，對於長期以來與中國沿海各地進行貿易的大多數臺灣商人帶來巨大變局，究竟如何面臨原屬國內貿易，卻一夕之間變成國際貿易的格局，又除了原來條約港體制下西洋人的競爭之外，要如何面臨殖民政府積極扶持的日本商人，特別是大資本財團的競爭？很有趣的是，在殖民新體制下，1899年關稅改定之後，臺灣從西部到東部的花蓮、臺東以及離島澎湖，先後出現九百多家商號，透過長崎和神戶泰益號與日本殖民母國進行直接貿易。這個現象，再次展現臺灣商人不時面對危機的應變能力，如何轉危機為契機，甚至透過泰益號發展出東亞的商業貿易網絡。¹⁰⁵ 泰益號的貿易網絡遍及東亞，北至俄羅斯海參崴，並橫跨朝鮮、中國沿海港口、日本、臺灣，南至菲律賓馬尼拉、印尼、馬來西亞檳城、新加坡、泰國曼谷等地。¹⁰⁶ 這個網絡，正反映了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講閩南語、進行東亞進出口貿易的郊商所逐漸擴展形成的活動圈，¹⁰⁷ 未來如能透過東亞各地域華商給泰益號的商業書信，從全球史視野進行跨國、跨地域的比較研究，不僅可以闡釋東亞不同政權、時代背景、在地條件與貿易型態之間的關聯和動態變化，更能進一步突顯臺灣商人及其商業網絡建構的策略和特色。

最後，臺灣歷史在明年（2024）迎接 400 年。臺灣史一開始就是站在世界舞臺上，接受來自全世界各種政商勢力和人群的洗禮，甚至進一步建立政權。臺灣史，特別是臺灣社會經濟史，不能不立基於世界史或全球史來觀察。從荷蘭時代

¹⁰⁵ 林玉茹，〈貿易網絡的創新與挑戰：臺北大稻埕老源順號文書中的社會經濟活動樣態（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四年）〉，收於林玉茹主編，《臺北大稻埕商業文書：陳源順號（一）（一九〇一-一九〇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3），頁 2-45。

¹⁰⁶ 中國、朝鮮、日本、臺灣、印尼包含眾多地區和城市。詳見「長崎泰益號文書介紹」，《長崎泰益號文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數位典藏），識別號：T1001，「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下載日期：2023 年 11 月 30 日，網址：https://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search_detail.jsp?xmlId=0000335029。

¹⁰⁷ 前人研究往往僅用會館和公所來看泰益號所形成的商業組織，然而由泰錫號和泰益號文書帳冊名稱，可見「郊」的使用。有關郊、郊商的出現和運作，參見林玉茹，〈政治、族群與貿易：十八世紀海商團體郊在臺灣的出現〉，《國史館館刊》（臺北）62（2019 年 12 月），頁 23-33。

至 1970 年代，臺灣已建構出農業和商業強烈連結、獨特的海島型外銷導向經濟體，與具有巨大內銷市場或可以自給自足的大陸型經濟體極為不同。未來如何站在前人研究的積累上，發掘新史料，並從宏觀或微觀的視角，重新省思舊議題或提出原創性的新課題，繼續探究臺灣經濟奇蹟的生成，仍待臺灣社會經濟史研究者共同努力。

六、閉幕式



圖十二 閉幕式

說明：主持人許雪姬。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提供。

許雪姬

臺史所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除了我們自身的努力之外，也有賴外部給予的鼓勵與協助，以及臺史所和一些機關團體的合作，共同創造臺灣史研究的基礎，未來希望臺灣史研究能更加國際化、多元化，不僅關注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也要留意底層或是文化史、地圖圖像方面的研究。三十年的歲月對個人而言是三十而立，臺史所也應該朝著更堅強、更穩定、更進步的方向來前進，在此僅代表臺史所向各位道謝。

引用書目

- 《長崎泰益號文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數位典藏)，識別號：T1001，「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下載日期：2023年11月30日，網址：https://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search_detail.jsp?xmlId=0000335029。
- 林文凱，〈從世界史比較視角重新認識「清代中國史」：評 Peter C. Perdue 著，《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2021年7月30日)，公共史學網站「歷史學柑仔店」，下載日期：2023年7月31日，網址：<https://reurl.cc/q0R86E>。
- 陳素玲，〈瑞士洛桑管理學院2023年世界競爭力排名 臺灣晉升至全球第6名〉(2023年6月20日)，「聯合新聞網」，下載日期：2023年7月22日，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7238/7247363>。
- 小泉文夫
1984 《歌謡曲の構造》。東京：冬樹社。
- 山室信一
1998 〈植民帝国・日本の構成と満州国：統治様式の遷移と統治人材の周流〉，收於ピーター・ドウス (Peter Duus)、小林英夫編，《帝国という幻想：「大東亜共栄圏」の思想と現実》，頁155-202。東京：青木書店。
- 中村孝志
1997 〈荷蘭時代之臺灣農業及其獎勵〉，收於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頁49-71。臺北：稻鄉出版社。
- 王泰升
1997 《台灣法律史的建立》。臺北：王泰升。
2008 〈學說與政策交織下的日治臺灣民事法制變遷：以岡松文書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臺北) 37(3): 47-95。
- 王崧興
1973 〈濁大流域的民族學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濁大流域人地研究計劃民族學研究專號」(臺北) 36: 1-10。
- 王晴佳
2017 《臺灣史學史：從戰後到當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永積洋子(著)、劉序楓(譯)
1999 〈由荷蘭史料看十七世紀的臺灣貿易〉，收於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輯・上冊）》，頁37-57。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刑義田
2021 《立體的歷史：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增訂三版。
- 朱介英
2016 《偶像行銷：理論與實務兼具的流行音樂行銷課綱》。臺北：雨彤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吳豪人
2017 《殖民地的法學者：「現代」樂園的漫遊者群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吳叡人

2016 《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新北：衛城出版。

吳叡人（著），梅森直之、山本和行（訳）

2023 《フォルモサ・イデオロギー：台湾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勃興 1895-1945》。東京：株式会社みすず書房。

吳聰敏

2023 《臺灣經濟四百年》。臺北：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周翔鶴

2014 〈胸中的航海圖：郁永河《裨海紀游》手繪“宇內形勢圖”（示意圖）研究〉，《海交史研究》（泉州）2014(2): 56-74。

岡本真希子

2008 《殖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台湾総督府と帝国日本》。東京：三元社。

東印度公司（原著），村上直次郎（原譯），郭輝中（譯），王詩琅、王世慶（校訂）

1970 《巴達維亞城日記》，第2冊。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東嘉生

1954 〈清代臺灣之貿易與外國商業資本〉，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初集》，頁103-126。臺北：臺灣銀行。

林文凱

2007 〈地方治理與土地訴訟：清代臺灣竹塹地區金山面墾隘土地控案的社會史分析〉，《新史學》（臺北）18(4): 125-187。

2007 〈清代地方訴訟空間之內與外：臺灣淡新地區漢墾莊抗租控案的分析〉，《臺灣史研究》（臺北）14(1): 1-70。

2011 〈「業憑契管」？：清代臺灣土地業主權與訴訟文化的分析〉，《臺灣史研究》（臺北）18(2): 1-52。

2011 〈再論晚清臺灣開港後的米穀輸出問題〉，《新史學》（臺北）22(2): 215-252。

2012 〈再論清代臺灣開港以前的米穀輸出問題〉，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頁99-133。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4 〈晚清臺灣開山撫番事業新探：兼論十九世紀臺灣史的延續與轉型〉，《漢學研究》（臺北）32(2): 139-174。

2016 〈清代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論檢討：「地方法律社會史」研究提出的對話〉，收於柳立言主編，《史料與法史學》，頁311-348。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17 〈臺灣「中央財政」體制的轉型：日治初期（1898-1905）後藤新平總督府財政改革之歷史意義〉，《中央大學人文學報》（桃園）63: 1-44。

2017 〈臺灣近代統治理性的形構：晚清劉銘傳與日治初期後藤新平土地改革的比較〉，《臺灣史研究》（臺北）24(4): 35-76。

2018 〈日本治臺經驗取鑑：戰前福建官方的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之分析（1911-193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101: 117-155。

2018 〈晚清臺灣的財政：劉銘傳財政改革的歷史制度分析〉，《臺大歷史學報》（臺北）61: 341-392。

- 2017 〈清代臺灣與近代早期英格蘭的土地制度與經濟發展：一個統治理性的比較制度分析〉，《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臺北）55(1): 65-128。
- 2018 〈貌合神離之兩岸關係：戰爭前夕福建與臺灣的經建與農業調查之交流（1934-1937）〉，《臺灣史研究》（臺北）25(4): 119-162。
- 2019 〈清代到日治時代臺灣統治理性的演變：以生命刑為中心的地方法律社會史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90(2): 317-365。
- 2019 〈第六章 清帝國在臺灣的早期現代統治理性：對東、西方現代性演變的再思考〉，收於湯志傑主編，《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從臺灣出發的反省》，頁 269-32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2021 〈晚清奉天省土地改革與日本關東州土地調查：統治理性與調查學知之比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114: 41-82。
- 2022 〈東亞近代學知交會與認同流動專號導言〉，《新史學》（臺北）33(1): 1-12。
- 2023 〈從臺灣到滿洲：以關東都督府警政建設為中心的日本帝國統治學知移轉分析（1905-1918）〉，《臺灣史研究》（臺北）30(1): 45-86。

林玉茹

- 2007 〈商業網絡與委託貿易制度的形成：十九世紀末鹿港泉郊商人與中國內地的帆船貿易〉，《新史學》（臺北）18(2): 61-102。
- 2019 〈政治、族群與貿易：十八世紀海商團體郊在臺灣的出現〉，《國史館館刊》（臺北）62: 1-51。
- 2020 〈跨國貿易與文化仲介：跨政權下臺南第一富紳王雪農的出現〉，《臺灣史研究》（臺北）27(4): 35-82。
- 2022 《向海立生：清代臺灣的港口、人群與社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23 〈貿易網絡的創新與挑戰：臺北大稻埕老源順號文書中的社會經濟活動樣態（1901-1904）〉，收於林玉茹主編，《臺北大稻埕商業文書：陳源順號（一）（一九〇一-一九〇四）》，頁 2-45。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林滿紅

- 1978 《茶、糖、樟腦業與晚清臺灣》。臺北：臺灣銀行。
- 1999 〈臺灣商業經營的中國傳承與蛻變〉，收於黃富三、翁佳音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頁 1-44。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姜萬吉

- 1995 《일제시대빈민생활사연구（日治時代貧民生活史研究）》。首爾：創作社。

施添福

- 1989 〈臺灣歷史地理研究割記（一）：試釋土牛紅線〉，《臺灣風物》（臺北）39(2): 95-98。
- 1989 〈臺灣歷史地理研究割記（二）：竹塹、竹塹埔和「鹿場半被流民開」〉，《臺灣風物》（臺北）39(3): 73-82。
- 1989 〈清代竹塹地區的「墾區莊」：萃豐莊的設立和演變〉，《臺灣風物》（臺北）39(4): 33-70。
- 1996 《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上、下冊）》。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 1998 〈清代鹿港地區聚落的血緣結構：以家族史料的建立為例〉，發表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合辦，「臺灣史研究暨史料整理成果研討會」，6月1日。

- 2001 〈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臺灣史研究》（臺北）8(1): 1-39。
- 2001 《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 2009 〈國家與地域社會：從中國歷史上的鄉里制度談起〉，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第二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暨施添福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12-13日。
- 2018 〈社會史、區域史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北部內山的研究方法論為中心〉，《臺灣風物》（臺北）68(3): 91-114。
- 柯志明
- 2005 〈歷史的轉向：社會科學與歷史敘事的結合〉，《臺灣社會學》（臺北）10: 149-170。
- 2015 〈跨學科的歷史研究法〉，收於瞿海源、畢恆達、劉長萱、楊國樞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頁211-239。臺北：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2018 〈臺灣社會變遷研究的歷史轉向：對整體觀與貶抑歷史敘事的一點反思〉，《臺灣社會學刊》（臺北）63: 1-62。
- 若林正丈
- 1992 《台灣：分裂国家と民主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翁佳音
- 1987 〈日治時代平埔族的調查研究史〉，《臺灣風物》（臺北）37(2): 55-80。
- 郝延平
- 1997 〈中國三大商業革命與海洋〉，收於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六輯）》，頁9-44。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高承恕
- 1999 《頭家娘：臺灣中小企業「頭家娘」的經濟活動與社會意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張素玢
- 2004 《歷史視野中的地方發展與變遷：濁水溪畔的二水、北斗、二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張隆志
- 1991 《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個清代臺灣平埔族群史的重建和理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 2009 〈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臺灣史研究》（臺北）16(4): 161-184。
- 曹永和
- 1954 〈荷蘭與西班牙佔據時期的臺灣〉，收於林熊祥等著，《臺灣文化論集（一）》，頁105-122。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2000 〈環中國海域交流史上的臺灣和日本〉，收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頁1-36。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莊宏年
- 2021 〈附錄 臺灣風物編務成員年表〉，《臺灣風物》（臺北）71(1): 135-153。
- 許宏彬
- 2023 〈醫療渴望地方、地方渴望照護：回顧並展望臺灣醫療史的地方性〉，《臺灣史研究》（臺北）30(3): 179-225。

許雪姬

2010 〈臺灣史研究三部曲：由鮮學經顯學到險學〉，《思想》（臺北）16: 71-100。

2023 〈第壹篇：歷史篇 第一章：臺灣史田野研究時期（1986.8-1993.6）〉，收於許雪姬、鍾淑敏主編，《旗展帆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三十年》，頁 16-41。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許雪姬、鍾淑敏（主編）

2023 《旗展帆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三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陳其南

1987 《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延媛（編著）

2012 《看不見的殖民邊緣：日治臺灣邊緣史讀本》。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宗仁

2002 〈東亞海域多元勢力競爭下雞籠、淡水地位的轉變(1400-17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5 〈近代臺灣原住民圖像中的槍：兼論槍枝的傳入、流通與使用〉，《臺大歷史學報》（臺北）36: 53-106。

2005 《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6 〈西班牙文獻中的福建政局（1626-1642）：官員、海盜及海外敵國的對抗與合作〉，收於呂理政主編，《帝國相接之界：西班牙時期臺灣相關文獻及圖像論文集》，頁 323-338。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2008 〈Lequeó Pequeño 與 Formosa：十六世紀歐洲繪製的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臺大歷史學報》（臺北）41: 109-164。

2008 〈略論晚明月港的開禁問題：兼論通商舶、徵商稅與福建軍情之轉變〉，收於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十輯）》，頁 101-142。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10 〈1626 年的大員港灣：一位澳門華人 Salvador Díaz 的觀察與描繪〉，收於戴文鋒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II》，頁 1-31。臺南：臺南縣政府。

2012 〈前往東、西洋：〈字內形勢圖〉解析及其地緣政治想像〉，《臺灣史研究》（臺北）19(3): 1-46。

2022 《Selden Map 與東西洋唐人：地理知識與世界景象的探索（1500-1620）》。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陳宗仁（主編）、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

2003 《世紀容顏：百年前的臺灣原住民圖像（上冊）——頭目、勇士及傳統工藝篇》。臺北：國家圖書館。

2003 《世紀容顏：百年前的臺灣原住民圖像（下冊）——日常生活、服飾及家族人物篇》。臺北：國家圖書館。

陳宗仁（編撰）

2013 《晚清臺灣番俗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陳培豐

2020 《歌唱臺灣：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變遷》。新北：衛城出版。

2022 〈雙重解殖與「臺灣味音樂」的形塑（I）：臺語流行音樂之路（劉清池篇）〉，《臺灣文學研究彙刊》（臺北）27: 107-145。

陳慈玉

- 1995 《臺北縣茶業發展史》。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曾文亮

- 2010 〈全新的「舊慣」：總督府法院對臺灣人家族習慣的改造（1898-1943）〉，《臺灣史研究》（臺北）17(1): 125-174。
- 2010 〈戰火下的辯護士：「黃繼圖日記」中的臺灣人法律社群經驗〉，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主辦，「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臺中：國立中興大學綜合教學大樓13樓國際會議廳，8月19-20日。
- 2012 〈日治時期臺灣土地調查事業中的「家產」問題及其解決〉，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頁349-384。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2015 〈二二八事件中的叛亂與懲罰：兼論戰後初期國民政府的政治、軍事與法律關係〉，《臺灣史研究》（臺北）22(4): 83-122。
- 2015 〈殖民地臺灣的辯護士社群與法律職業主義〉，收於李承機、李育霖主編，《「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頁91-133。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2015 〈臺灣日治初期土地關係的接收、整理及其影響，1895-1905〉，《成大歷史學報》（臺南）49: 257-313。
- 2019 〈日本統治期における台湾人家族法と殖民地統合問題〉，收於松田利彦編，《植民地帝国日本における知と権力》，頁235-260。京都：株式会社思文閣出版。
- 2020 〈戰後臺灣對日治時期法制的詮釋與評價（1945-1970）〉，收於李承機、李育霖主編，《帝國在臺灣II：「日本時代」的歷史記憶》，頁71-10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2021 〈日治時期臺灣人家族舊慣改革與女性法律地位〉，收於陳延湊主編、林政佑校訂，《從臺灣與朝鮮反思日本的殖民統治》，頁71-113。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2021 〈鈴木宗言與總督府司法制度改革〉，收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輯，《第11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67-393。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湯志傑（編）

- 2019 《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從臺灣出發的反省》。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隅谷三喜男、劉進慶、涂照彥

- 1992 《台湾の経済：典型 NIES の光と影》。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黃丞儀、鄭毓瑜、單德興、戴麗娟、詹素娟、蕭阿勤

- 2023 〈「面對幽暗歷史」的多元路徑：記憶書寫、歷史現場與時代轉折下的「人類境況」座談會紀要〉，收於莊瑞琳總編輯，《春山文藝3：李登輝100年專輯》，頁133-207。臺北：春山出版有限公司；桃園：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主編）

- 2010 《帝國邊緣：臺灣現代性的考察》。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黃富三

- 1987 《霧峯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一七二九-一八六四）》。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1992 《霧峯林家的中挫（一八六四-一八八五）》。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2004 《林獻堂傳》。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2006 《臺灣水田化運動先驅施世榜家族史》。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2009 〈17世紀臺灣農商連體經濟的啟動〉，收於陳益源主編，《200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21-142。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金門：金門縣文化局。
- 2012 〈世界史中的臺灣史：學術生涯回顧〉，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頁 553-565。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2012 〈臺灣農商連體經濟的興起與蛻變（1630-1895）〉，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頁 3-36。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主編）
- 1997 《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 I：1867-1881》。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黃富三等（解讀），何鳳嬌、林正慧、吳俊瑩（編輯）
- 2013-2017 《霧峰林家文書集》，共六冊。臺北：國史館。
- 黃富三、陳慈玉
- 1995 〈商業的發展〉，收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近代史・經濟篇》，頁 311-404。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黃頌文
- 2010 〈清季臺灣貿易與寶順洋行的崛起（1860-1870）〉，《臺灣文獻》（南投）61(3): 107-149。
- 楊彥杰
- 1992 《荷據時代台灣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詹素娟
- 1987 〈從中文文獻資料談平埔族研究〉，收於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研究組編輯，《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論文集》，頁 243-284。高雄：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
- 劉益昌
- 2002 〈世紀考古學者張光直先生與臺灣考古學〉，收於胡健國主編，《20 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 81-107。臺北：國史館。
- 劉斌雄
- 1987 〈臺灣南部地區平埔族的阿立祖信仰〉，《臺灣風物》（臺北）37(3): 1-62。
- 劉翠溶
- 1992 《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 劉翠溶、伊懋可（主編）
- 1995 《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 歐陽泰（Andrade, Tonio）（著）、鄭維中（譯）
- 2007 《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潘英海
- 1987 〈有關平埔族研究的西文資料〉，《臺灣風物》（臺北）37(2): 39-53。
- 1987 〈平埔族研究的困惑與意義：從邵式柏的博士論文「十七及十八世紀臺灣拓墾中的漢番關係」談起〉，《臺灣風物》（臺北）37(2): 157-165。
- 鄭力軒
- 2022 《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臺灣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鄭根植

- 2013 〈차별 또는 배제의 정치와 소수자의 사회사 재구성 (超越歧視與排除的政治，重構弱勢群體的社會史)〉，《경제와사회 (經濟與社會)》(首爾) 100: 183-208。

駒込武

- 2000 〈「帝国史」研究の射程〉，《日本史研究》(京都) 452: 224-231。

韓家寶 (Heyns, Pol) (著)、鄭維中 (譯)

- 2002 《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臺北：播種者文化公司。

Davidson, James W.

- 2005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Elster, Jon

- 2009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First Social Scientist*.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vin, Mark and Ts'ui-jung Liu 劉翠溶 (eds.)

- 1998 *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ld, Thomas B. 高棣民

- 1986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Lin, Yu-Ju 林玉茹

- Accepte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of Human Resources and Knowledge in East Asia: A Case Study of Taiwan Merchant Wang Xuenong (1870-1915) and His Trading Compan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iu, Ts'ui-jung 劉翠溶 (ed.)

- 2014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ast Asia: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2016 *Local Realitie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Liu, Ts'ui-jung 劉翠溶, Andrea Janku and David Pietz (eds.)

- 2018 *Landscape Change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East Asia: Perspectives from Environmental History*.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Merton, Robert K.

-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Meskill, Johanna Menzel

- 1979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 1729-189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hin, Gi-Wook 申起旭 and Michael Robinson (eds.)

- 1999 *Colonial Modernity in Kore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Wu, Rwei-ren 吳叡人

- 2003 “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PhD.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ioneering and Prospering: Symposium of 3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Hsueh-chi Hsu, Su-chuan Chan, Lung-chih Chang, Ts'ui-jung Liu, Fu-san Huang,
Teng-fu Shih, Rwei-ren Wu, Wen-kai Lin, Wen-liang Tseng, Pei-feng Chen,
Jungwon JIN, Tsung-jen Chen, and Yu-ju Lin (author)

Sheng-chuan Chuang and Wei-chi Chen (edit revisions)

ABSTRACT

In celebration of its 30th anniversary of establishment,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held a symposium on August 1, 2023, presided by Director Hsueh-chi Hsu and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Rwei-ren Wu, convener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Research Group. The symposium started from reviewing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Institute, with the Taiwan History Field Research Project proposed by Academician Kwang-chih Chang (1931-2001), through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from the Taiwan History Field Research Office to the Preparatory Office and finally to the formal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e. From diverse perspectives, the symposium assessed how the Institute evolved over the years, pointing out that some changes were gradually accumulated from past trajectories, some were developed along the path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within the discipline, some were academic practices that answered social concerns, and some were new research areas in response to important issues of the times.

The symposium comprised four sessions in total. In the first session, "Fieldwork and Multiple Origins,"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Su-chuan Chan talked about the Taiwan History Field Research Project, the predecessor of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nd the founding spirit, academic practices, and continued developments of the Taiwan History Field Research Project; and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Lung-chih Chang, now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reviewed the posi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historiography with multiple origins from the social context of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knowledge. In the second session, “Pioneers and Prospects,” Academician Ts’ui-jung Liu, Adjunct Research Fellows Fu-san Huang and Teng-fu Shih, all seniors of the Institute who have made great academic achievements, shared their respective academic journeys.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and practice are traditions esta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since its beginning. Therefore, in the third sessio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and Practice”,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s Rwei-ren Wu, Wen-kai Lin and Wen-liang Tseng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achievements and reflections in studying Taiwan history with a background of non-traditional history discipline. The fourth session i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Research Fellows Pei-feng Chen and, Tsung-jen Chen, and Yu-ju Lin and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Jungwon JIN, who all have recently published important research findings and initiated novel research fields from fresh perspectives and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s other than written materials, shared their respective academic experiences.

Keywords: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30th Anniversary, Historiograph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